

802  
~~1048~~  
~~2121~~

✓

6 JUL 16 1959  
Cont. Copy

# 政法研究

ZHENG-FA  
YANJIU

2

**1959**  
PLEASE RETURN TO  
R EASTERN LAW DIVISION  
LAW LIBRARY



# 政法研究

一九五九年 第二期目录

社論：向伟大的共产主义目标迈进	[1]
我国人民民主法制的几个問題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政法工作”研究小組 [3]
政法工作必須絕對服从党的领导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政法工作”研究小組 [9]
群众路綫是我国政法工作的根本路綫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政法工作”研究小組 [13]
“五四”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	张 岂 之 [17]
坚决支援古巴、刚果、喀麦隆人民的反帝斗争	何 戊 双 [22]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总書記諾尔曼致各分会書記的信	[25]
評論：抗議南越吳庭艳集团的滔天罪行	[26]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通告	[28]
評論：抗議希腊当局迫害馬諾里·格列索斯	[28]
人民公社的出現标志着我国基层政权进入了新的 发展阶段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国家法教研室集体写作 [30]
从一个公社看人民公社的优越性	許 醒 亚 潘 华 仿 [34]
人民公社的組織原則——民主集中制	曾 庆 敏 [38]
論合同制度	协 鳴 [41]
关于资产阶級法权残余問題	北京大学法律系科学研究小組 [44]
关于按劳分配和资产阶級法权残余問題	孙 亚 明 [51]
对本刊編輯工作的检查和改进意見	本刊編輯部 [55]
动态：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吉林分院法学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北京大学法律系、北京政法学院各一則	

## 政法研究

(双月刊)

1959年 第2期

4月2日出版

編輯者 政法研究編輯委员会 总发行处 北京市邮局  
北京东城区王福海胡同3号  
电话：4.4351

出版者 法律出版社 訂 購 处 全国各地邮电局  
北京东城区十二条龙君堂9号  
电话：4.3851

印刷者 北京新华印刷厂 代訂零售处 全国各地新华書店

定价：每册0.30元

上期实际出版日期2月22日



## 彻底平定西藏叛乱

**编者按：**当本刊本期将要出版的时候，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彻底平定西藏叛乱命令，这个命令，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一致的拥护。现将“人民日报”三月三十一日的社论“彻底平定西藏叛乱”转载于此。

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和外国反动派，公然撕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劫持达赖喇嘛，发动武装叛乱。这种背叛祖国、破坏统一、破坏民族团结的严重罪行，是全国各族人民包括西藏爱国人民所绝对不能容许的。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已经奉命彻底平息叛乱。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已经发布命令，解散这次叛乱的组织者西藏地方政府，并决定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现在，人民解放军在西藏爱国僧俗人民的积极协助下，已经迅速荡平了拉萨地区的叛乱，并且正在肃清西藏其他一些地区的叛匪。西藏僧俗各界爱国人民热烈拥护中央措施，声讨叛国集团，全国其他地方的各民族人民，也都一致声讨西藏反动集团的叛国罪行。我们向遭受叛匪蹂躏的西藏各界同胞表示亲切的慰问，向在平定叛乱中建立功勋的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致以崇高的敬意。

西藏民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它和国内其他民族一样，对于我们伟大祖国的缔造和发展，有过自己的贡献。但是在近代，由于帝国主义的侵入，由于满清王朝和国民党反动政府采取民族压迫和民族离间的政策，也由于西藏反动统治集团对内奴役人民，对外投靠帝国主义，西藏人民长期陷于黑暗、穷苦和落后的深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西藏实现了和平解放，回到了祖国大家庭。从那时以来，中央人民政府对于西藏一贯地坚持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和逐步实现民族区域自治、逐步实现民主改革的政策。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努力促进汉藏两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和团结。中央也尽力促进藏族内部、首先是达赖喇嘛和班禅之间的团结。1956年4月，经过同西藏地方政府的充分协商，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筹备

委员会，由达赖喇嘛任主任委员，班禅任第一副主任委员，并广泛吸收藏族各阶层人士参加。进驻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一贯严守纪律，爱护人民，尊重当地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不取群众一针一线，并且举办农场、工厂、医院和学校，修桥筑路，帮助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因为这一切，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受到了西藏各界广大群众的热烈爱戴。

西藏人民迫切要求实行民主改革，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实行改革，要使西藏繁荣进步是不可能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规定，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西藏军队应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虽然如此，鉴于西藏地方的特殊历史情况，中央一贯的方针是努力加强民族团结，耐心等待西藏上层分子的觉悟。西藏和平解放后，对于西藏原有的政治制度、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和职权、寺院的收入，中央均未予变更；各级僧俗官员也照常供职。对于过去亲帝国主义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表示脱离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关系，中央也不咎既往，仍让他们继续任职。甚至对于那些在解放后仍然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革命分子，中央也只是责成西藏地方政府负责惩处，没有直接逮捕法办。中央所以采取这样的等待和宽大的政策，完全是以祖国的统一为重，以民族团结为重，给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人士以充分的考虑时间。1956年底，中央并向西藏地方政府宣布，在六年內，即在1962年以前，在西藏可以不进行民主改革；在这以后什么时候改革，仍然要根据将来的情况，由西藏民族领袖、上层人士以及人民群众共同协商解决。

但是，西藏的反动集团根本不要区域自治，他们要的是帝国主义侵略者多年策划的所谓“西藏独立”；他们利用在噶厦中的地位，利用在国外的噶

倫堡为勾結帝国主义、蔣介石匪帮和外国反动派的中心，积极糾集叛匪，指使这些叛匪燒杀搶掠、殘害人民、袭击人民解放軍駐地和交通綫，并且組織非法的所謂“人民會議”，准备一旦聚集了相当力量，就馬上撕毀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協議，取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这个反动集团自以为他們能够利用宗教迷信长期欺騙西藏人民；他們以为帝国主义、蔣介石匪帮和外国反动派会給他們有力的支援，他們以为印度等邻国会成为他們的靠山，他們把中央的耐心等待和寬大为怀的态度看作是軟弱无能的表现。因此，他們有恃无恐，叛乱活动由秘密到公开，由小規模到大規模，直至发动全面的武装叛乱。

許久以来的种种事实表明，西藏反动集团不但是祖国統一和汉藏两大民族团结的破坏者，而且是西藏民族繁荣进步的絆脚石。中央虽然早已察覺西藏地方政府的种种罪恶活动，但仍然采取仁至义尽的态度，屡次告誡他們負責制止，期待他們最后能够幡然悔悟。甚至在3月10日拉薩叛乱发生后，中央仍然作最后的努力，要他們悬崖勒馬。但是，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頑固不化，竟然劫走达賴喇嘛，对人民解放軍駐西藏部队发动全面軍事进攻，摧毁了和平解决的希望，走上了自取灭亡的道路。在这种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央才命令人民解放軍駐西藏部队对西藏叛国集团进行討伐，彻底平定叛乱。因此，西藏各界爱国人民充分認識到，中央人民政府为了維護民族团结确已尽了最大的努力，而在現在，只有討平叛乱，彻底粉碎罪大恶极的叛国集团，才是繼續維護民族团结的唯一道路。

目前在西藏的首要任务是彻底肃清一切叛乱分子，建立和平秩序。关于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所将采取的各项政策，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区的布告和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公报，都已经作了明确的說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和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区将坚决团结全西藏一切沒有参加叛乱的僧俗人民；就是对于叛乱分子，也将本寬大政策，区别对待，即来归者不咎既往，立功者給予奖励，对俘虏不杀不辱，只对頑抗者給以严惩。人民解放軍駐藏部队將繼續坚持尊重群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保护文物古迹的一貫方針。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將行使地方政府的职权，并且积极促进西藏地方民族自治的实现。在达賴喇嘛被劫持期間，由班禅額尔德尼代理主任委員职务。当然，西藏叛

国集团的叛乱，証明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是必要的，但是关于实行改革的时机、步骤和办法，中央仍将同西藏上中层爱国人士和各界人民群众进行充分的协商。我們相信，在粉碎了叛乱集团以后，无论汉藏两民族的团结和藏族人民的内部团结，一定会大大加强，在这个基础上，西藏必将逐步走上繁荣进步的光明大道。

西藏反动集团的叛国活动，一直是在帝国主义者的支持下进行的。在3月10日拉薩叛乱发生以后，帝国主义者曾經以为，他們梦想已久的所謂“西藏独立”这一下将成为事实了。因此他們就大喊大叫，为西藏叛国集团助威。然而，好景不常，人民解放軍迅速平定了拉薩地区的叛乱。于是，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就集中宣传火力攻击人民中国。美国国务院接連发表了几次声明，污蔑中国政府破坏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協議，說什么中国要“摧毁宗教和政治自治”，并且假惺惺地“对于处于这种野蛮干涉下的西藏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人們記得，八年以前，当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協議的时候，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反动派曾經大肆攻击这个協議。現在，他們搖身一变，却又成为这个決議的捍卫者了。这是一个多大的諷刺！美国国务院的誣蔑是不值一駁的，因为破坏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協議的、不要西藏实行民族自治的，并不是中央人民政府，恰恰是为美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支持和慫恿的西藏反动集团。西藏的叛乱和叛乱的平定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外国不得干涉純属中国内政的西藏叛乱事件。甚至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也說，美国从来不認為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大家知道，著名的五項原則，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是首先由我国同我国的伟大的友好邻邦印度在1954年4月29日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提出的。同年6月，我国周恩来总理和印度尼赫魯总理又发表联合声明，庄严地宣布这五項原則是指导中印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从那时以来，这五項原則也是中国和亚非国家、特别是与西南邻国相处的共同原則。我們很高兴地看到，在西藏叛乱发生后，印度总理尼赫魯在3月23日发表了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声明。我們相信，中印两国政府將繼續忠实地遵守五項原則，不允許我們两国的友好关系受到損害。



# 社論

## 向伟大的共产主义目标迈进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代表大会已经在2月5日胜利闭幕了。这次大会的召开是当代国际政治生活中具有异常重要意义的一件大事。大会总结了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提出了苏联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宏伟纲领。全世界人民都从这次大会得到巨大的鼓舞。人类的最崇高的理想——共产主义——不要太久的时间就将变成现实了。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同志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1959—1965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的报告中和大会所作的决议中指出：目前苏联已经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在今后七年中的主要任务，在经济方面是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进一步加强苏联的经济力量，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大提高；在政治方面进一步巩固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加强苏联人民的统一和团结；在思想方面加强党的思想工作，提高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在国际关系方面继续贯彻列宁主义的和平政策。

七年计划是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宏伟的计划。它规定今后七年中，苏联高速度地发展国家的生产，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使国民经济一切部门的生产都获得全面的发展。苏联今后七年中，工业总产值将增长80%，这个增长的部分将等于苏联最近二十年所增长的产值。七年后，苏联钢产量将要达到八千六百万吨到九千一百万吨。七年内，农业生产的总产值将增加70%，保证充分满足苏联人民对食品的需要和工业对原料的需要，并且保证国家对农产品的一切其他需要。七年内国民经济投资总额将达到三万亿卢布，大约等于苏维埃政权整个年代中投资的总和。苏联的国民收入到1965年几乎要比战前1940年的水平增加五倍。职工和集体农民的实际收入都将提高40%左右。今后七年中，苏联近五分之一的居民将迁入新的住宅，生活消费品将大大增加，工作日将继续缩短。七年计划规定：要在最新科学基础上，建立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的工业和农业，逐步实现完全电气化，一切生产过程的全盘机械化和自动化，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技术水平，进一步改善生产组织和提高劳动生产率。

七年计划为苏联向共产主义过渡不仅准备了物质条件，并且准备了精神条件。计划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工作，提高劳动人民、首先是成长中的一代的共产主义觉悟，把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同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联系起来。在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时，还必须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思想残余作坚决的斗争。

赫鲁晓夫同志在报告中指出：今后七年的根本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和平经济竞赛中最大限度地赢得时间。因此，苏联七年计划规定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在今后七年中，苏联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将增加约8.6%，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将增加8%；而美国近几年来工农业生产的增长都只在2%左右。在七年计划完成时，苏联某些主要工业产品的绝对产量将超过美国现在的工业生产水平，其他一些产品的产量将接近于美国现在的水平；苏

联主要的农产品的总产量和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也都将超过美国现在的水平。到七年计划实现的时候，苏联将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工业品产量方面超过英国和西德，再过五年或早一些时候，苏联将在工业产品的绝对产量和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方面都超过美国而跃居世界第一位。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和平经济竞赛的胜利前景，再一次说明了进步的社会主义制度比起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有无比的优越性。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整个社会主义体系同资本主义体系进行着经济比赛。最近五年来，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工业生产每年平均增长11%，而资本主义体系增长还不到3%。根据估计，到苏联七年计划完成后，由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的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阵营的工业产量将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一半以上。到那时候，社会主义体系在物质生产方面将对资本主义体系取得压倒的优势。

苏联七年计划将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和世界和平的力量。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满怀信心地认为在和平经济竞赛中社会主义必将战胜帝国主义。到苏联七年计划实现的时候，由于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经济力量的大大增长，世界力量的对比将更加有利于和平，帝国主义要想发动世界战争就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了。

国际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于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已取得了日新月异的成就。1957年十一月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进一步加强了。在莫斯科会议宣言照耀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日益蓬勃地发展，各国的共产主义战士团结一致地进行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空前地加强了自己的团结。苏联七年计划的实现将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但是，应当记住，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并未停止对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因此，我们必须用一切办法来加强社会主义力量，必须根据莫斯科会议宣言的原则进一步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苏共第二十一代表大会激励着全世界的共产党人进一步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加伟大的胜利。

苏联人民沿着十月革命所指出的道路，在光荣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下，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伟大的七年计划，并将攀登到共产主义的高峰；同样，我们深信，苏联共产党的团结一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巩固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坚强团结，将一定促使人类日夜盼望的共产主义早日实现。





# 我国人民民主法制的几个問題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政法工作”研究小組

法制是阶级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論认为，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必然会具有与这个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必然要积极地巩固和发展它的基础服务。法制的实质在于它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历史上没有也不可能有一般的适用于任何类型社会和为任何阶级服务的法制，只能有具体的适用于某一社会和为某一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法制。因此法制具有最强烈的阶级性。

我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在摧毁国民党反动派的国家机器的同时，也采取了种种有效的措施，坚决彻底地废除了反动的法制。国民党的反动法制，是保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压迫和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因此，在全国解放前夕，中共中央就发布了“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制定的“共同纲领”中，也规定了废除国民党反动法制与建立人民法制的原则。根据上述指示和原则，建国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民，在组织上、思想上和工作作风上与反动法制展开了不调和的斗争。特别是通过司法改革运动以及整风和反右派的斗争，严格地批判了旧法观点，整顿和纯洁了组织，清算了旧司法作风。与此同时，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需要，并在总结群众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了人民民主法制。我们的法制是工人阶级为首的劳动人民意志的表现，是实现

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它的基本任务在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镇压已被推翻的阶级敌人和一切反革命、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切反抗，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促进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保障我国建成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为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创造条件。

## 一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我们党和政府一向坚持无产阶级的法制工作路线，并且与资产阶级的法制工作路线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我们的法制工作在一方面都必须置于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必须从实际出发，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贯彻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群众路线是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法制工作不能例外。我们的法制工作正是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进行的。我们的法制工作一向都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都是按照这条路线取得胜利的。

我国的法制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我们的法不是来源于少数人的头脑和书本，而是来源于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经验，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创造和智慧。人民群众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创造出来的经验，才是我国法制的真正源泉。列宁曾经指出过，“只有集体的经验，只有千百万群众的经验，才能在这方面给我们左右一切的指示……”。

我们不仅在制定法律的时候，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就是在修改法律、法令和规章制度的时候，也同样是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党和政府鼓励、支持人民群众对那些不合理

的阻碍生产发展的和已经过了时的法律、规章制度，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展开群众性的讨论，以便废除那些不合理的，修改那些不符合实际情况需要的，而保存合理的法律、规章制度。因为人民群众从事实际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他们对那些法律、规章制度是适合需要，对生产有促进作用，那些是妨碍生产发展，影响群众积极性发挥的，感触最直接最具体。同时人民群众的智慧又是无穷无尽的，不仅能够打破旧的规章制度，而且也能够建立起适合需要的新的规章制度。

当然在强调法制来自群众的同时，也不应忽视专门机关的作用。专门机关的作用就在于将群众所创造出来的经验集中起来，加以总结提高，使原来比较分散的和无系统的材料，变为集中和系统的经验，然后再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试验，成熟以后，制定成法律、规章制度，再进行全面推广，普遍贯彻。这就说明，专门机关的工作必须以群众的经验和客观发展的需要为转移。总之，我们的法制工作是自下而上、上下结合进行的。专门机关的工作必须与群众的创造结合起来，才能发挥专门机关应有的作用。

依靠群众，大走群众路线，是我国法制工作的优良传统。正因为过去坚决执行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法制工作原则，因此我们才能够制定出许多行之有效的法规，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为了适应全国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形势的需要，全党全民办政法，这是政法工作群众路线的进一步发展，也是政法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法制工作是整个政法工作的组成部分。必须在我们的法制工作中，进一步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继续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吸引人民群众参加法制建设工作；进一步总结人民群众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创造出来的宝贵经

验，为建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我国人民民主法制提供更加丰富的内容。

资产阶级右派反对我国法制工作的群众路线，诬蔑群众革命运动是“不守法”。他们企图篡改我国法制工作的性质，窒息人民民主法制，使早已被人民革命运动所摧毁的反动法制复辟，为恢复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权铺平道路。在人民内部，也有些人由于受了资产阶级法律观点的影响，把法制工作看得很神秘，认为法制工作只有少数“法律专家”才懂得，认为法制工作只能由少数“内行人”才能搞。因而他们不主张依靠群众，总结群众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经验来立法，而主张只依靠少数“法律专家”来立法。这种主张，和群众路线正是针锋相对的，它片面强调了少数“专家”的作用，而根本忽视广大群众创造法制的作用。我们必须坚决地破除对少数“法律专家”的迷信，破除对法制工作专门性和神秘性的迷信，彻底肃清资产阶级法律观点的影响，坚持法制工作的群众路线。

## 二 不断发展变化，不断革命

我国人民民主法制是革命的法制，它是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随着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形势和任务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也就是说，它是随着社会的不断革命而本身进行不断的革命，以便适应不断革命的形势，为不断革命的任务服务的。建国以来，我国一个革命运动接着一个革命运动，一个革命任务接着一个革命任务：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人民公社化运动等等。这些革命任务和革命运动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它们一个个的不断进行，就使得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使得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一日千里地飞跃前进。而我們的人民民主法制，也就是在这些革命任务和革命运动的进展中，为这些任务和运动服务，为社会主义經濟基础的巩固和发展服务，而不断发展起来的。

剝削階級的法制是少数人統治多数人的法制。为了維護少数人的統治，并且妄图把这种統治永远固定下来，剝削階級一般总是說法律是不可改变的永恒真理，企图以此把人民圈起来，束縛起来，使人民不能对他們进行反抗。而我們的法制是絕大多数人統治少数人的法制，是人民的法制，是革命的法制，是为不断革命服务的法制，因此它无论如何也不能束縛革命人民自己的手足。我們国家制定的法律，一般总是把原則性和灵活性很好地結合起来，既給群众指出了奋斗的目标和方向，同时又使他們革命的积极性和創造性能够得到發揮。这就說明我們国家的法律是发展的法律，是符合不断革命的精神的。为了貫徹不断革命的精神，不仅在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时候要考虑到原則性和灵活性相結合的問題，而且当一旦发现法律已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經濟基础发展的需要、不符合革命斗争的需要时，就应毫不犹豫地加以废除或修改。例如整风运动期間和整风运动以后，我們許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对于过去所制訂的規章制度作了全面的检查和整理，发现不符合实际需要的，或束縛群众手足、束縛生产力发展的，就立刻經過一定手續加以废除或修改。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

当然，这不是說由于法律有灵活性就毫无稳定性可言。一般說法律是有相对稳定性的，但是法律的这种相对稳定性只是当它适应經濟基础的需要、适应革命的需要时才会有，如果由于情况变化，法律已不能适应經濟基础的需要、适应革命的需要，那末它的相对稳定性也就不存在了。同时，法律的相对稳定性也并不排斥它的部分內容可以作修改

变动，因为法律的相对稳定性反映了事物的相对靜止状态，而事物的变化則是絕对的。

另有一錯誤观点，即所謂“法制完備論”。按照这种調，只有当国家制定了这种和那种法典的时候，法制才算完備的，否則就是“不完備”。这种观点忽視了，我們国家制定法律是要从实际出发的，是为不断革命服务的。实际需要什么，革命要求什么，我們就制定什么。我們决不能脫离实际的需要，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地搞一套固定化的东西，来束縛革命人民的手足。而主张这也制定法典那也制定法典的人，却正是不問我們国家实际上需要与否，而硬要我們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地搞一套所謂完備的东西，也就是硬要把我們国家的法律固定化起来。因此这种主张也是不符合不断革命的精神的，也是对革命对建設不利的。我們要反对这样一种錯誤的观点。

总之，我們的法制乃是人民群众的法制，是革命的法制。它是人民群众自己創造出来，并为不断革命服务的。我們只能用不断革命的观点，才能正确理解我們法制的实質，也才能正确地运用我們的法制。一切离开不断革命的观点都是錯誤的。

### 三 从实际出发，原則性和灵活性相結合

毛主席教导我們，确定任何一个方針、政策、办法，都必須从实际出发，他說：“我們是馬克思主义者，馬克思主义叫我們看問題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針、政策、办法来。”（“毛澤东选集”，第三卷，第875頁）这也是我們法制工作的指針。

我国人民民主法制，是实现无产阶级專政，进行階級斗争的工具。因此，制定和运用法制，必須从階級斗争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階級斗争的規律，亦即根据各个时期的政治形势。只有如此，才能使法制工作有效

地發揮打击敌人保护人民的作用。

为了使法制工作适合社会主义建設的迫切需要，推动社会主义經濟基础和生产向前发展，在制定和运用法制时，必須从社会主义經濟基础的現狀和生产发展的水平出发。我們党历来是从我国现实的經濟条件出发，根据我国社会經济发展的客观規律，制定和运用法制的。

我們坚持从实际出发，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出发，反映群众的意志，忠实地代表群众的利益。我們党在法制工作上一向坚持这一原則，因而我国法制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实践証明，由于我們党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則，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密切結合的原則，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出发，根据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制定和运用法制，因而有力地打击和分化了敌人，促使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以人們难以想象的速度向前发展。

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則，必須将原則性和灵活性結合起来。按照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客观規律和必然趋势，但是社会发展的过程是极为复杂而变化多端的。根据客观規律和必然趋势，我們能够制定指导一定时期革命斗争的总原則，但是，根据发展过程的复杂性，我們又必須有灵活性。因此，原則性和灵活性相結合，乃是客观必然性的反映。我国是一个地广人众、多民族的大国，各地区的經濟和文化发展水平不一致，政治情况也有所不同，为了使法制切实地贯彻执行，發揮地方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創造性，我們党在法制工作上也象其他工作一样，一貫坚持原則性和灵活性相結合。党领导制定法制，总是根据一定时期的阶级斗争和經济发展規律，提出任务并定出完成任务的总原則，同时也十分注意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灵活性，給予

各級党組織和国家机关根据总原則制定适合具体情况的政策、法律和規章制度的权力，也注意政策和法律內容上的灵活性，例如“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規定，我国人民公社在社会主义分配方式上，实行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但同时規定，工資部分和供給部分各占多少，要看各个公社生产发展的不同情况来决定。

正是由于我們的法制具有原則性和灵活性，因而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有的人不了解这一点，总想法律規定越詳細越好，他們說，法律既然是政策的条文化具体化，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就必事无巨細，一律規定进去，越具体越好。这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空想。条文化的法律对相应的政策說来，可以說是比較具体些，但是，法律对于发展着的客观实际說来，毕竟是一般原則，不可能規定得那么具体詳尽，因为客观实际是十分复杂的，而且在不断发展变化。如果事无巨細一律規定在法律上，这将束縛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手足，对于对敌斗争和发展生产都是不利的。列宁說得好：“要在法令中写出某些具体的指示是不可能的。我們本来就是規定一般的原則，希望各地有覺悟的同志們忠实地去执行。并且善于想出許多办法，按照各地的具体經济条件来实施这个法令。”（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說）

对于司法机关和干部來說，在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和法律的时候，从实际出发，把原則性和灵活性結合起来，是很重要的。我們在对敌斗争中，必須根据阶级斗争的形势和需要，正确地灵活地运用政策和法律。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使政策和法律在阶级斗争中发挥作用，准确及时地打击敌人，保卫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我們知道，阶级斗争的形势在各个时期有所不同，在各个地区也是大体相同而又不完全相同的，因此，我們必須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运用党的政策



和策略。当然，我們在灵活运用党的政策和法律时，絕不能离开党所制定的总原則。这是應該注意的。

#### 四 为无产階級专政服务， 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

如前所說，人民民主法制是无产階級专政的工具，因此人民民主法制的首要任务，就在于鎮压敌人、懲罰犯罪、保护人民。无产階級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必須有巩固的政权，革命的社会秩序，才能保証社会主义建設事业順利进行。但是被推翻的反动階級和各式各样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他們千方百計地进行各种破坏和顛复活动，不对他們进行坚决鎮压，无产階級政权就不能巩固，这是已被各国无产階級革命实践所証明了的确定不移的真理。为无产階級专政服务的人民民主法制，其鋒芒必須对准反革命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乱說乱动，对于这个问题不能有任何怀疑和动摇。同时，为了維護革命的社会秩序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对其他破坏社会主义建設的犯罪分子也必須懲罰。只有坚决鎮压敌人，懲罰犯罪，才能有效的保护人民。

我国人民民主法制也是为适应經濟基础的需要，为促进社会主义經濟基础的巩固和发展而服务，为促进社会主义經濟建設和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而服务。上述人民民主法制的专政任务，也正是为了要排除和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和社会集团对于建立和发展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阻碍和反抗，保障社会主义經濟建設得以順利进行。同时，人民民主法制必須要把改造旧經濟、組織新的社会主义經濟建設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最近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及时发布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这将大大促进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經濟建設的进一步发展。

为了对敌人进行斗争，为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設，人民民主法制还調整着人民内部的

种种关系，人民民主法制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統一思想和行动等各个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

人民民主法制也是党用来提高人民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質的重要工具，它具体地規定了我們要反对什么，保护什么，爱什么，憎什么，所以通过法制的贯彻执行和广泛的宣传教育，能够有效地提高人民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質。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人民民主法制是为无产階級专政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的工具。現在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任务，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明确指出：“經過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組織形式，根据党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設的总路綫，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逐步地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經濟全面地实现全民所有制，逐步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現代工业、現代农业和現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为此，当前我国人民民主法制也应为实现这些任务，繼續开展对敌斗争，繼續保卫人民公社的巩固、提高，保卫鋼鉄生产和以鋼为綫的工业建設，保卫党的一切中心工作。

#### 五 党的政策是法制的灵魂，党的 领导是法制工作的根本保証

党的政策是人民民主法制的灵魂，人民民主法制是实现党的政策的工具。这就是說，党的政策是法制工作的統帥，法制工作絕對不能离开党的政策；法制工作只能是为党的政策服务的工具，不能是超越于政策之上或之外的任何別的东西。否則，法制工作就要犯“左”或右的錯誤。

我們党的政策是以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根据一定历史时期階級斗争的形势和社会发展規律而制定出来的，它指导国家机关

和人民群众为解决社会物质生活发展过程中那些已经成熟了的任务而奋斗。因此，党的政策在国家生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党是我们国家的领导核心，党的政策是党对国家实行领导的基本工具。国家机构的一切活动，都必须而且只能根据党的决议和指示行事；国家机构在自己的活动过程中，把党的政策具体化、条文化，表现为法律、法令和规章制度等等并保证其实施，从而形成人民民主法制，并把它作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由此可见，人民民主法制是党用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具，因此，法制工作仅仅是根据和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工作，是为党的政策服务的工作。

法律、法令和规章制度等只不过是党的政策的体现，因此，党的政策乃是立法工作的依据，任何法规都必须根据党的政策来制定。否则，法规就不能真正体现党的政策，也就不可能为党的政策服务，从而就会成为一纸空文。党的政策不仅是制定法规的依据，同时也是运用法规的依据。我们知道，法规是党的政策的体现，只有根据党的政策来理解法规，才能真正了解法规的精神实质，才能正确地运用法规；同时，根据客观形势的需要，党的政策不一定要制定为条文形式的法规。因此，在运用法规时，就不能不依据党的政策。如果不依据党的政策来运用和执行法规，必然离开党的领导、离开政治，其结果就不能正确地运用和执行法规，而使它失掉专政武器的作用。

既然党的政策是法制的灵魂，法制是实现党的政策的工具，法制就必须随着党的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党的政策也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随着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客观要求，只有党才能全面地了解和掌握，因而只有党的政策才能最及时地反映客观形势的需要；为了使法制及时地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必须适应党的政策

而对法律、法令和规章制度进行必要的废、改、立。

既然党的政策是法制的灵魂，法制工作不过是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工作，法制工作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党的领导是法制工作的根本保证。只有党才能正确地规定出法制工作的根本路线和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没有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人民民主法制。因此，立法活动和司法活动以及其他法制工作都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忽视和削弱党对法制工作的领导，都是极端错误的。

如前所说，立法工作必须以党的政策为依据，这是很重要的。不仅如此，立法工作还必须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来进行，因为只有党能洞察整个经济发展和政治斗争的客观形势和需要，最善于科学地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能够集中人民群众的意志和要求，因此，对于根据客观形势和需要立什么法和如何立，只有党最清楚。

司法工作同样地必须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来进行。司法工作必须依据党的政策办事，这是贯彻党对司法工作领导的重要方面。但是，还有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司法工作的整个活动必须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来进行。司法工作是运用和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和法律的工作，要正确地运用党的政策和法律，必须从当时当地的阶级斗争形势和党的中心工作出发，而阶级斗争形势和中心工作只有党才能全面了解和掌握。因此，司法机关的活动，只有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才能及时准确地打击敌人，确保党的中心工作的顺利进行。

总之，法制工作必须服从党的绝对领导，党的领导是法制工作的根本保证。经验证明，法制工作稍有忽视和脱离党的领导倾向，工作就要出毛病，革命就要受损失；只有坚决地服从党的绝对领导，政治思想挂帅，才能贯彻党在法制工作中的正确路线，使法制工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执笔人 尹平、谷纯德、李景森、高明喧)



# 政法工作必須絕對服從黨的領導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政法工作”研究小組

我國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黨的領導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核心，沒有黨的領導就沒有無產階級專政，更不會有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關於黨在我国的領導地位，毛主席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開幕詞中曾明確地指出：“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我國憲法不但在序言中肯定了黨的領導，第一條也明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而工人階級對國家的領導是通過自己的先進部隊——共產黨來實現的。黨的領導地位是我國憲法莊嚴規定了的。

當前，我國正經歷着自己歷史上的偉大飛躍發展時代，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正在全面大躍進。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黨的領導必須加強。劉少奇同志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中指出：“黨的正確的領導是一切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勝利的保證。”中國共產黨章程總綱中也明確規定：“黨是階級的最高組織，它必須努力在國家生活的各个方面發揮它的正確的領導作用和核心作用，反對任何降低黨的作用和削弱黨的統一的分散主義傾向。”這就是說，為了保證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勝利，我國的任何一項工作，任何一個部門，不管是國家機關還是群眾組織，都必須有共產黨的統一領導，所以黨的領導是絕對的、全面的，不能加以削弱和限制。任何一項工作，任何一個部門，如果離開了黨的領導，就會迷失方向，離開人民，離開社會主義

道路。因此，要不要黨的領導，這是關係着我國是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讓資本主義復辟的根本性問題。

黨在我国的領導地位，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這是黨的性質所決定的，是我國百餘年來的革命歷史經驗所肯定的。劉少奇同志在黨的八大的政治報告中指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的力量，在於它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武器，有正確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有丰富的鬥爭經驗和工作經驗，善於把全國人民的智慧集中起來，並且把這種智慧表現為統一的意志和有紀律的行動。”所以在我国，黨不僅必須領導一切，而且完全能夠領導一切。只有黨的絕對領導，才能保證逐步地把我國建成為一個具有高度發展的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並為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創造條件。

黨是無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的統帥和司令部。政法工作是廣大勞動人民對敵人實行專政的一種重要武器；政法機關的根本任務是鎮壓敵人，懲罰犯罪，保護人民。政法機關必須在黨的絕對領導之下，牢牢地掌握在黨的手中，成為黨的馴服工具。政法機關也只有在黨的絕對領導下，服從自己統帥的指揮，根據黨在各個時期的中心工作來安排自己的活動，才会有明確的政治方向，才能保證完成自己的任務，有效地發揮專政武器的作用，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

我們都知道，我國過渡時期的階級鬥爭是長期的，階級鬥爭的形勢很複雜，並且經常發生變化。由於黨掌握着階級鬥爭的規律，最了解整個政治形勢和地區特點，最全

面地掌握着政策法律的精神實質，最熟悉劳动人民的感情和要求，把政法工作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党就可以从全局出发来权衡利弊，指导、监督政法机关正确地进行活动。政法机关也只有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领导和监督，按照党的意志办事，才能适应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地区特点，正确地贯彻执行政策法律，狠狠地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加强对他們的监督改造，并合情合理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可見，党的绝对领导是作好政法工作的根本保证。

## 二

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首先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党的方针政策是以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根据各个时期阶级斗争形势和建設事业发展的需要，总结群众革命斗争的经验而制订的，它集中地反映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广大劳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成为进行各种工作的依据和指针，所以党制订工作中的方针政策，是实施领导国家事务的一个重要方面。有了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一切工作在政治上都有了方向，就会沿着正确的路綫前进。如果在工作中离开了党的方针政策，必然会迷失方向，在政治路綫上发生严重錯誤。

政法机关必须接受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把党的方针政策作为自己一切活动的指针。只有这样，它才能够适应阶级斗争和敌我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正确地地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有效地为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設服务。必须了解，政法机关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是否正确，是直接关系到对敌斗争的成效，关系到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任何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违反，都是严重的原則性錯誤，必然給工作造成重大損失。

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关键，在于加强调查研究，切实掌握阶级斗争和敌我

斗争形势，提高工作中的自觉性和预见性，并且适应各个地区和民族的特点，做到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过去的經驗也証明了，做好了调查研究，掌握了政治形势，工作就主动，党的方针政策就贯彻得好，缺点和錯誤就少一些，打击敌人也更准更有力。

为了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政法干部必须加强对方针政策的学习。在学习中应当联系实际，联系思想，把学习方针政策与研究当前阶级斗争形势结合起来，与澄清和提高干部的思想認識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深刻领会党提出的方针政策的依据和它的精神實質，才能在实际工作中正确地贯彻执行。如果学习方针政策不联系实际，忽视它的精神實質，也就不能正确地贯彻执行。

政法机关服从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与服从各级党委的決議、指示和对具体工作的领导是密不可分的，这是因为，方针政策是党制订的，党的組織是統一的整体，地方党委是贯彻执行中央意图的，它們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精神實質领会最深刻；地方党委为了結合地区特点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往往作出決議和指示；同时党委了解整个政治形势，掌握地区的全面情况，最能从全局出发来处理問題。因此，政法机关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时，只有绝对服从各级党委的领导，坚决执行党委的決議和指示，經常向党委汇报工作，加强向党委請示报告，接受党委对具体工作的监督、检查，才能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才能使党的领导作用得以实现。否則，党在方针政策上的领导就会落空。由此可見，右派分子叫囂党只能在方针政策上领导，不能对政法工作进行具体领导，实际上就是要摆脱和取消党的领导，因而这种叫囂只不过是他們的一种反党借口。

## 三

人們的行动反映自己的思想，正确的政治思想决定人們正确地行动。毛主席在“关



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中教导我们说：“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刘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也指出：“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永远是一切工作的灵魂和统帅。在任何情况下，放弃或者忽略党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就会脱离群众，迷失方向。”“各级党委都应当注意党内党外的思想动向，加强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政法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其工作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思想性，尤其需要加强党的政治思想领导。只有加强了党的政治思想领导，以政治为统帅，以虚带实，使政法干部自觉地兴无灭资，具备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政法工作才能坚持正确的路线，才能有效地同资产阶级观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作斗争。反之，如果忽视党的政治思想领导，只问业务不问政治，必然会在阶级斗争和对敌斗争中辨不清风向，软弱无力，甚至还会走到邪路上去，给工作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教育干部克服资产阶级思想，树立共产主义思想，是党的一项经常的政治思想工作。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中教导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对政法干部来讲，自觉地彻底地改造思想更为重要和迫切，因为政法工作的阶级性、思想性很强，如果政法干部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不关心党的利益，不能全心全意地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当然不能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担负起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因之，每个政法干部都应在革命斗争烈火中加强锻炼和改造，增强党性，树立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真正自觉地服从党的领导，听党的话，把自己的一切工作都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资产阶级法律观点和无产阶级法律观点是根本对立的，它和人民的利益是水火不相

容的。党在1949年2月宣布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的指示中，就明确指出司法机关应该经常以蔑视和批判六法全书的精神，来教育和改造干部。司法改革给了资产阶级法律观点以严重打击，但由于它有深厚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的时候，它总要顽强地表现出来，和无产阶级法律思想进行斗争。这两种思想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生死斗争的一种反映。反右派斗争证明，资产阶级法律观点是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法制进攻的思想武器和资本，它对政法干部的思想起着极端有害的腐蚀作用，使得政法工作在服从党的领导，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法律等方面，都受到极不利的影响。右派分子敢于向社会主义法制猖狂进攻，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政法界还有一些人分不清新旧法的界限；某些有资产阶级法律观点的人，在右派分子进攻的时候，甚至支持了某些右派言论。可见，资产阶级法律观点对政法工作的危害性是十分严重的，我们必须记取司法改革和反右派斗争的深刻教训，加强肃清资产阶级法律观点的斗争。

经过整风反右派斗争，对资产阶级法律观点进行了深刻的、彻底的揭发批判，给了它一个粉碎性的打击；同时，党加强了对政法工作的政治思想领导，政法干部的政治思想有很大提高，他们解放了思想，鼓足干劲，发扬了共产主义风格，破除陈规，大胆革新，在工作中创造了许多先进经验，取得了政法工作的大跃进。但必须了解，彻底肃清资产阶级法律观点，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斗争过程，所以为彻底肃清资产阶级法律观点而斗争，仍然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也是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 四

党对政法机关的组织领导是实现党的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的保证，如果没有党的组

組織領導，黨在方針政策上的領導就會落空，黨的政治思想領導也不能實現。政法機關的黨的組織，同時實現着黨的組織領導。

為了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加強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必須增強黨在政法機關的力量，保持政法機關組織上的純潔性。所以黨挑選和派遣共產黨員或雖非黨員但經過考驗真正忠於社會主義事業的人來擔任政法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司法改革和整風反右派鬥爭證明，階級敵人為了實行反革命復辟，總是想利用各種機會鑽入政法機關，並在政法機關內部尋找他們的代理人，伺機奪取無產階級專政的“刀把子”。如果他們的反革命陰謀稍有得逞，政策法律就會遭到嚴重的歪曲和濫用，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就可能逃脫法網。因此，我們應當堅決保持政法機關的純潔性。

黨組織是一個統一的整体，黨的領導是通過各級黨委來統一實施的，黨的組織領導既是指黨中央的領導，又包括地方各級黨委的領導，如果排除了地方黨委的領導，實際上也就取消了整個黨的領導。因此，政法機關必須在組織上服從各級黨委的領導，既要服從中央和上級黨委的領導，又要服從本級黨委的領導。

政法機關要發揮無產階級專政武器的威力，還必須在業務活動中堅決服從黨的絕對領導，按照黨的意志辦事。

前已講過，根據我國憲法序言和第一條規定，黨對我國的一切工作，一切部門，都有絕對的領導權，政法機關是國家機關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工具，必須置於黨的絕對領導之下，一切活動都要受黨的領導和監督。在我們這裡，服從法律和接受黨的領導，完全是統一的，任何

一個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為了履行“效忠人民民主制度，服從憲法和法律”（憲法第十八條）的義務，首先就應服從憲法第一條規定，接受黨的領導。

無數事實證明，只有保證黨對政法工作進行具體領導，加強黨對政法機關貫徹執行政策法律的具体情况進行監督、檢查，才能有效地防止和糾正政法工作中可能發生的違法現象，保證政策法律的正確貫徹執行。當然，這不是說黨的工作和政法機關的工作沒有區別，也不是說政法機關所處理的一切案件，黨都要過問一番，或者由黨組織代替。凡是政法機關職權範圍以內的事情，仍由政法機關辦理，但黨有權過問一切，黨委的具體領導需要採用什麼形式來實現，則應由黨委視具体情况而定。

根據上述，黨完全應該而且必須領導政法工作，黨的絕對領導是作好政法工作的根本保證。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包括方針政策上的、政治思想上的、組織上的和業務上的領導。黨的領導是絕對的、全面的，不能加以絲毫限制和削弱，任何反對和忽視黨的領導的現象，都是不能容忍的。我們的任務是要堅決維護和加強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堅決和一切不利於黨的領導的傾向作鬥爭。

加強黨的領導的關鍵，是政法幹部政治掛帥，加強党性鍛煉，提高覺悟，使自己成為堅強的共產主義戰士，不僅在組織上服從黨的領導，而更重要的是提高服從黨的絕對領導的自覺性，永遠做黨的馴服工具，聽黨的話，按照黨所指的方向前進。只有政法幹部自覺地做黨的馴服工具，政法工作才能成為黨的得心應手的馴服工具。

（執筆人 陳逸雲）



# 群众路線是我国政法工作的根本路線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政法工作”研究小組

群众路線是我們党的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和工作路線，也是政法工作必須遵守和貫徹的根本路線。我們国家是党領導下的劳动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国家，办理一切事情，党从来都是从人民群众的要求出发，集中地代表群众的利益，并充分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来实现他們的要求。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实践中，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事实充分証明：只要群众起来了，发挥了他們的积极性和創造性，一切事情都好办了，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住我們，任何敌人也只能被我們击潰和打倒。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線以及“两条腿走路”的一整套方針，就是我們党的群众路線在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的具体运用和发展。1958年工农业战綫和其他社会主义建設各个战綫取得的輝煌成就，就是党的群众路線的新的巨大胜利。因此，党一再教导我們，一切工作都必須貫徹群众路線，依靠人民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

政法机关是具体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工人阶级和它領導下的人民群众对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分子的专政。因而，对敌人实行专政，既是专政机关的事情，也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情。为了有效打击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破坏社会秩序、危害人民利益的犯罪分子，保卫党的中心工作，为党的总路線服务，必須全党全民动手，必須

把专门机关的活动和广大群众的积极行动結合起来。为此，政法工作在党的领导下，更必須認真地貫徹群众路線，深入群众，联系群众，重視和支持群众的創造，发挥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实行全党全民办政法。

政法工作走群众路線是它生气勃勃和威力的源泉，是获得巨大成績的“法宝”。因为，群众起来了，觉悟提高了，眼睛擦亮了，隐蔽的敌人，就无处藏身，反、坏分子，就不敢伸手，只要他們抬头翘尾，敢于犯罪作案，就会被广大群众把他們抓住，或者揭发检举出来，帮助政法机关迅速破案；由于有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参加，政法机关就能够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弄清是非，正确地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法律和法令，既能合法、及时、又准又稳又狠地打击敌人，而且又能使敌人和其他犯罪分子易于認罪服法，接受改造。广大群众和专门机关的活动相結合，就能够高度地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既稳且狠地打击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又能有效地改造那些可能放弃反动立場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阶级分子，从而創造安全环境，保障党的各項中心工作和經濟建設的順利实现。实现全民办政法，人民内部的糾紛也容易解决了。大量的糾紛，在政法机关的指导下，可以通过群众自己調解、座談会、辯論会等形式加以解决，及时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力量，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同时，通过这些活动，也就对人民群众进行了实际的社会主义法制教育，提高了群众守法观念，并且进一步密切群众与政法机关的关系，取得群众对政法工作的监督。

認真貫徹群眾路線，實行全民辦政法，不仅可以有效地同敵人作鬥爭，有效地保衛經濟建設，而且可以鍛煉勞動群眾自己維護社會秩序、社會治安和集體利益的自覺性，使他們既能生產，也能處理他們之間有關集體利益和社會安全的事情，這就有它更為深遠的意義。

## 二

政法工作走群眾路線是它的優良傳統，它是我們黨和毛主席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和我國革命鬥爭實踐創立和發展起來的。毛主席關於從實際出發，依靠群眾，實事求是，調查研究，証據口供都必須經過查對，以及其他如傾聽群眾呼聲、有事和群眾商量、肅反工作中的路線是群眾肅反的路線等等指示，就是從我國革命鬥爭中總結出來的政法工作應該遵守的原則。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領導下，我國政法工作始終不渝地堅持了這一正確的唯物主義的路線。早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和抗日戰爭時期，政法工作無論在組織、制度上，或者是工作方法上，都普遍地採用和貫徹了群眾路線。例如，在保衛工作方面，曾普遍地建立過群眾性的治安保衛組織，發動群眾訂立“防奸防特”、“防火防盜”等公約；偵查工作中，一貫地採取了讓群眾揭發檢舉和深入群眾進行調查研究的方法；司法工作方面，實行了便利人民群眾的公開審判、旁聽群眾有權發言、就地調查、就地審判、巡迴審判等一系列體現群眾路線的審判制度和審判方式；此外，並總結和推廣了群眾自我“排難解紛”的民間調解工作，等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這些行之有效的貫徹群眾路線的組織、制度和工作方法，在新的條件下，得到了進一步運用和發展，並在許多法規中明確地規定下來。例如，1954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七十五條以及其他有關各條，就是總結了群眾路線的歷史經

驗而具體規定下來的。

貫徹群眾路線的這些組織制度和工作方法，使我國政法工作保持了堅強的戰鬥力，完成了黨和國家交給它的各個歷史時期的具體任務，發揮了作為無產階級專政工具的威力，對於革命事業和經濟建設起了積極的作用，深為廣大群眾所擁護和稱贊。

但是，這一路線的發展，是經過了同它的對立面的嚴重鬥爭的。

政法工作是大走群眾路線，發動群眾，依靠群眾，實行全黨全民辦政法呢？還是關門办案，只依靠專門機關少數人，冷冷清清地孤立办案呢？這個根本問題有部分政法幹部對它認識不清，發生過長期的爭論，因而使群眾路線的貫徹受到若干影響。

我們有些同志，由於受舊法觀點的侵蝕和影響，把政法工作神秘化孤立化，把法律看成是一種特殊玄妙的東西，把依規章程序辦事與群眾路線對立起來；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眾，生怕群眾把事情弄壞，生怕走群眾路線“麻煩”；甚至把走群眾路線說成是“農村作風”、“游擊習氣”、“不正規”等等。這種思想，實際上也是資產階級思想在我們革命隊伍中的反映。具有這種思想的人不懂得，我們的政法工作是根本不能離開群眾的，沒有廣大群眾的協助、支持和參加，就不能取得對敵鬥爭的巨大勝利，就不能正確地貫徹執行黨的政策和實現政法機關的任務；同時，他們也沒有真正懂得專門機關和廣大群眾相結合的好處。只有集中群眾的智慧，才是最大的智慧。事實上，許多疑難案件，只要依靠群眾，認真地調查研究，便能迎刃而解，迅速破案或結案，從而有效地打擊敵人的破壞活動。

具有這種思想的人，也是沒有真正懂得，我們的法律就是廣大勞動人民群眾意志的集中表現，是群眾創造的，是群眾進行鬥爭的工具。群眾可能不會背誦某些法律術語概念，但他們是革命鬥爭和生產的直接參加者，從



他們的立場和切身体会中，最懂得党和国家政策和法律的精神實質，最能公平地評断各种行为和事件，所以群众既是法律的主人，又是善于維護和执行法律的人。法律只有为群众所掌握，才能正确地被执行，才能發揮它的威力。至于那种說走群众路綫是“不正規”的說法，更是錯誤的。因为政法机关的任何程序，都是为对敌斗争和解决某些人民內部矛盾服务的。我們認為正規的标准應該是：从实际出发，能够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既有利于对敌斗争，又簡易便民，凡是符合这一要求的就是正規的办法。同时，它也是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如果把程序看成是永恒不变的，以一套固定的程序，来束縛群众的革命斗争，則是十分錯誤的。

### 三

一年来，經過伟大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特别是政法工作大跃进以来，广大政法干部在严肃批判了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的基础上，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并以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大大發揮了独创精神，彻底轉变了某些脱离群众的作风。他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大大發揚了群众路綫的优良傳統，把过去貫徹群众路綫的各种良好形式运用得更加广泛和生动了，而且又把整风、反右派斗争中的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报的方法，灵活地运用到政法工作中来，創造了群众路綫的新形式，如发动群众揭发坏人坏事；依靠群众加强对反坏分子的监督和改造；深入群众，結合生产劳动，就地办案；审判与群众辯論相結合，开“辯論会”等等。使政法工作的群众路綫有了新的、重大的发展。以上这些方法，都使专门机关与广大群众結合起来，法律制裁与群众揭发、批判結合起来，法庭审判与群众辯論結合起来，政法工作与群众性的法制宣传教育結合起来，是政法工作大跃进以来貫徹群

众路綫的重要創造。貫徹这条路綫的結果証明，发案率愈益下降，破案率大大增加，办案質量显著提高，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和犯罪分子，保卫了党的中心工作，促进了生产建設，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和革命干劲。有的群众贊揚政法机关这种群众路綫办案的方法說：“共产党来真英明，样样案件断的清，条条道理有交代，鉄面无私胜‘包公’。”

要認真地和正确地貫徹群众路綫，首先，必須絕對服从党的領導，必須依靠各級党委的領導。只有在党的絕對领导下，全党动手，才能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

其次，政法干部必須树立起强烈的群众观点，要有高度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精神。这是貫徹群众路綫的思想基础和首要条件。政法工作是鎮压敌人、保护人民的，只有具有高度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精神，与人民群众有共同的思想感情，才会憎恨敌人，坚决及时地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来支持群众的斗争和要求，保护群众的利益；也只有虚心向群众学习，关心群众，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和群众打成一片，才能得到群众的信賴和支持，吸收群众丰富的斗争經驗，更好地打击敌人。不然，与群众格格不入，要想发动群众，真正地貫徹群众路綫，那是困难的。

再次，必須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放手发动群众，使专门机关与广大群众相結合。大跃进以来，生动的事实彻底駁倒了那些不相信群众、怕群众起来会把事情“搞乱”的錯誤看法。事实証明，群众参加办案活动，不仅沒有“搞乱”，而且搞得很好，广大群众都以非常認真严肃的态度来对待政法工作，不仅从各个方面揭发事实，提供証据，而且还能提出恰当的理由和正确解决案件的意見，这就使政法干部不太容易发现的証据，群众給补充了；政法干部想不到的問題，群众提出来了；政法干部一时不好解决的問題，由于群众出主意想办法，就迎刃而解。当然，大走群众路綫，并不是不要領

导，相反地，要大走群众路綫必須加强领导，必須把专门机关的活动与广大群众的积极行动结合起来。专门机关的活动与广大群众的积极行动是一致的。大走群众路綫，才能更好地发挥群众对敌斗争的积极性；有了专门机关的活动，才能更好地带领群众、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进行有效的斗争。只要两者相结合，就能肃清和消灭任何狡猾的敌人。不相信群众，孤立办案，是脱离群众的旧司法作风；“群众說怎样办就怎样办”，是尾巴主义者的主张。我們既反对前者，也要反对后者。因此，那种認為大走群众路綫就可以不要或者削弱专门机关工作的观点是錯誤的。事实证明，在大走群众路綫的同时，政法机关同样要加强调查研究，認真分析群众检举揭发的材料，选择适合群众辯論的案件，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向群众說明进行工作的方法和策略等。只有作好这些工作，才能更好更正确地贯彻群众路綫。

第四，必須坚持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原则。毛主席指出的从实际出发，依靠群众，实事求是，调查研究，重証据不輕信口供，証据口供都必須經過查对等，就是从对敌斗争的經驗中总结出来的政法工作的指导原则，我們必須坚持和贯彻执行。只有認真地贯彻执行这些原则，才能准确地掌握敌人的动态，采取符合实际情况的措施，战胜一切敌人。所以我們

大走群众路綫的同时，要坚持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原则；既要广泛地吸收群众参加办案活动，又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为此，在调查研究时，必須听取各方面的意見，不仅应重視和听取群众和有关机关的意見，而且也应当听取当事人的意見；不仅要搜集正面的意見，也要搜集反面的意見；同时，还应把群众路綫和阶级路綫正确地統一起来，对来自群众的意見和材料，也要以阶级分析的观点，加以研究分析；要慎重地对待揭发检举的問題，如果有矛盾，应再行調查和对証。总之，反映問題要客观全面，实事求是。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打击敌人，更好地提高群众。

最后，必須根据不同类型的案件和案件本身的特点以及其他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灵活的群众路綫的工作方法。如前所述，贯彻群众路綫的形式和作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在具体运用时（特别是决定把案件交群众辯論时），必須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考虑到案件的不同特点。例如，应当采取最有利于当时当地阶级斗争和党的中心工作的形式；采取便利群众，又为群众乐意接受的形式等等。总之，贯彻群众路綫，既要有利于对敌斗争，又要簡易便民；既能把政法工作办得又快又好，又能提高群众和鍛炼干部。

（执笔人 范明辛）





# “五四”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

——紀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

张 岂 之

“五四”运动所以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由国际国内的客观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从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起，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移到了俄国。俄国的工农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经历了1905年与1917年二月的资产阶级性民主革命，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这个时期正如列宁所说，是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世界历史发展中的第三时期，即亚洲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的风暴“盛行及其反轉来影响欧洲的时代”<sup>①</sup>。

貫穿于中国近代史的革命过程之中的，是汹涌澎湃的群众起义的巨流。这样壮阔的群众起义的場面确切地証明，中国人民正在朝着觉醒的道路上飞奔。列宁依据着俄国、中国和东方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中所显示出来的群众革命精神，科学地預言了“亚洲是世界风暴底新泉源”。

“五四”运动前，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虽然还没有科学理論的指导，沒有工人阶级的领导，但就其富有群众性这一点而言，是它鮮明的光輝，这一光輝的传统从“五四”运动时起为中国的先进阶级——工人阶级所繼承，所发揚。

与革命运动的群众性这一壮阔場面形成尖銳对照的，却是资产阶级对于革命运动领导的軟弱无力。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先进人物怀着滿腔热忱向西方寻求“真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康有为企

图效法日本的“明治維新”，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这条路沒有走通。资产阶级革命派則想在中国土地上建立起美、法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此，他們作了努力。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封建王朝。从此，帝制思想是不合法的了，这是辛亥革命的一大功績。辛亥革命后，革命胜利的果实被北洋軍閥头子袁世凱所窃夺，他演出了一出恢复帝制的丑剧。当时就有不少人悲叹：“仅有中华之名，无民国之实”。接着是軍閥混战。事实証明：西方资产阶级的各色各样的政治学說都不能够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問題；生活于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的和妥协的两面性，他們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虽然可以参加革命，但它无力领导中国人民完成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殖民地和附屬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时期，从国际方面看，这一革命运动开始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汇合为一条反国际帝国主义的洪流。

“五四”运动发生在东方的民族解放运动和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相汇合的伟大时代。毛澤东同志早就指出过，“五四”运动是彻底的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sup>②</sup>。

毛澤东同志的这个論断，是估計到“五四”运动时期的世界历史特点，而且还估計到

① “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

② “毛澤东选集”，第2卷，第639頁。

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内部所发生的变化。首先，中国工人阶级有了发展，在十月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开始了政治觉醒，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即1921年，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成立，负起中国革命领导者的任务。其次，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开辟了文化革命的新道路，开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并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思想展开了进攻。

中国工人阶级的资格，比之民族资产阶级，还要老些。当民族工业还十分微弱的时候，在帝国主义者所办的工厂里已雇佣了中国的工人。中国的工人阶级遭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的极其残酷的压迫；劳动条件极坏，工作时间极长，工资极低。在纺织工厂中，工作时间一般是十二小时，没有星期天，刚进厂的徒工，其工作时间更长，约在十八小时左右。在矿工厂中，根本没有安全的设备，因此，人身事故不断地发生。不仅如此，工人们毫无政治权利，遭受着各式各样的迫害。除去监工的毒打而外，还有诸如“停工、赔偿、解雇”等等名目的所谓“警戒”。罢工是明令被禁止的，1912年公布的“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第二百二十四条中就有这样反动的法律条款：“从事同一业务之工人，同盟罢工者，首谋处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罚金。余人处拘役或三十元以下罚金。”此外，军阀们用屠杀的血腥手段来镇压罢工，那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sup>①</sup>在“五四”运动前，当中国工人阶级还是自在的阶级，还未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时候，就曾对帝国主义、封建把头 and 资本家们进行过不断的斗争，举行过许多次罢工。

这时的罢工还是经济斗争性质。但从多次罢工中所显示的是工人阶级斗争的坚决性。在罢工的面前，剥削者除去严加镇压外，同时也感到畏惧和惊慌。例如，1912年汉阳兵工厂的职工联盟罢工，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是著名的。对于这一次罢工运动，帝国主义者也不能不加以注意，也不能不震惊于工人在罢工中所显示出的力量。

十月革命以及此后不久所爆发的德国、匈牙利等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朝鲜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等，当时曾在中国的一些进步报刊上作过介绍，这对于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有着推动作用。1919年6月3日全国工人声援“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反抗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大罢工，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开始政治觉醒的明显例证。以上海一地来看，这次罢工运动包括了各个工业部门，如五金工人、市政工人、轻工业工人、运输工人、纺织工人等约六、七万人<sup>②</sup>。工人在罢工斗争中虽受到帝国主义、军阀和买办的镇压与破坏，但仍然不屈不挠地斗争到底，充分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反帝反封建的坚决性与彻底性。沪宁、沪杭甬两路工人罢工的情况就足以说明。罢工开始时，受到多方阻挠，但工人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愿举行罢工。当两路车务总管得悉情况后，严加阻挠，同时发出布告，禁止工人罢工。工人感到异常愤怒，于6月10日全体罢工，停驶火车<sup>③</sup>。又如上海浦东陆家咀英美香烟厂五千余工人于7日准备罢工，这时，英美帝国主义分子玩弄他们一贯使用的狡猾的欺骗手段，说什么日本欺侮中国，他们“深为不平”，不过“爱莫能助”；以此阻挠工人罢工。工人识透了这种恶毒手段，义正词严地回答：“可怜学生被虐，可恨国贼卖国，痛心国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5页。

② 参见邓中夏同志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8、9页。

③ 参见“申报”1919年，6月10日、11日。



难，实无心工作，决定星期一（即9日）罢工。”<sup>①</sup>

在罢工过程中，上海求新机器厂工人在工厂门口建造了一座高六丈宽五丈的牌楼，上面写了“毋忘国耻”四个大字，在顶端悬有一大旗，写有“唤醒国民”四字。他们于6月7日给“申报”的信中说，鉴于“国势岌岌”，决定当日开始罢工，并建造牌楼一座，“惟期格政府之心，救灭亡之祸。”这些话不仅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意志，而且是反帝与反封建军阀政府的政治斗争的口号。

工人在罢工中所表现出的坚强斗争性、猛烈的声势、鲜明的反帝与反军阀政府的口号以及全国人民的抗议，迫使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的学生，不得不罢免章宗祥、陆宗輿和曹汝霖。但工人对此并不满意，甚至当时反动的“工部局警务处日报”也不能不加以报导，其中有这样的话：

“瑞锦洋行船匠及装配工，半数以上工人，于6月12日晨到厂，但拒绝复工，说他们对三个卖国贼的罢免还不满意。”<sup>②</sup>

上海商人虽也举行了罢市，但表现了软弱和动摇。6月7日淞沪护军使卢子善召开所谓“官民会议”，要求商界开市。在会上商界代表曹慕管说：“……大凡各行号经理或主人，事务纷忙，对罢市举动，尚不遑并力进行，各店伙竟至全体一致……”<sup>③</sup>。这说明店员工人在罢市中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同时说明了资产阶级的妥协性。

工人群众在罢工中所显示的力量和坚决性说明了两点，首先，工人阶级成长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要着手解决资产阶级不能解决的中国近代历史的课题。

其次，工人运动的发展以及工人运动中所暴露出的缺乏统一领导与统一组织的弱点，在客观上提出了组织战斗司令部，亦即建立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的要求。

“五四”学生爱国运动以及六月间的工人罢工，所提出的是鲜明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封

建军阀政府的口号，这是辛亥革命运动所未有的。

与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文化革命开始在中国的发生，这个文化运动是由受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的、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变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们所发动的。这样，就在新文化运动中增添了崭新的内容。

新文化运动是从1915年开始的，“五四”运动以前和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有着不同的质的变化。“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辛亥革命的民主精神的继续和发扬。一些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的大病在于旧道德、旧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代表）深入人心，使得人心不醒，因此，他们为了唤起人们的觉醒，便以“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向旧道德、旧思想展开了前所未有的、猛烈的进攻。他们战斗的武器是科学和资产阶级的人权论。1915年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其规模和深度都超出于前两次思想解放运动（即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但它并未正确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而其时的一些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对于帝国主义并无认识，也并未把文化运动和反军阀政府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

一些曾在新文化运动中冲锋陷阵过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如李大钊同志等，由于他们有着要求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强烈愿望，有着救国的大志，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

① “申报”，1919年，6月9日。

② “工务局警务处日报”，1919年，6月12日。

③ “申报”，1919年，6月8日。重点为引者所加。

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sup>①</sup> 他們在接受馬克思列宁主义之前或多或少地受过资产阶級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說的影响，因此，在接受馬克思主义与自我改造的过程中，是用过很深切的功夫的，表現了和资产阶級的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說实行彻底决裂的勇气和决心，因而在革命运动中锻炼成为馬克思主义者。

“五四”运动期間，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識分子滿怀着对于十月革命的敬仰心理来介紹俄国革命情况，李大釗同志在駁斥当时资产阶級右派代表胡适时就曾明确說过：“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談談布尔札維克主义的。……我总觉得布尔札維克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一大变动。我們應該研究他，介紹他，把他的真象，昭布在人类社会……。”<sup>②</sup> 他們当时宣传了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論，以及依据俄国革命所昭示的真理，反复闡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中国人民解放的必由之路。李大釗同志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結果，引起了“社会革命的潮流”，使得“民主主义”取得了胜利，这种“民主主义”不是属于英、美资本主义范畴，而是属于俄国的社会主义的范畴<sup>③</sup>。因此，在中国实行“民主”，不意味着建立资本主义共和国，而是要走俄国人的路。

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結合，是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識分子为桥梁的。他們組織了共产主义小組，并到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与組織工作。这样，就在理論上和干部上准备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和毛澤东同志依据着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問題的学說，密切結合中国革命的实际，規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整綱領。毛澤东同志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sup>④</sup> 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以及与此关联的工农联盟的思想，貫穿于毛澤东同志的每篇著作中，他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

命斗争的經驗时指出：“整个革命历史証明，沒有工人阶級的領導，革命就要失敗，有了工人阶級的領導，革命就胜利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級，都不能領導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中国的小资产阶級和民族资产阶級曾經多次領導过革命，都失敗了，就是明証。”<sup>⑤</sup>

正因为民主革命是工人阶級領導的，因而才有可能在民主革命取得胜利时又开始革命的新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近代的革命历史，如列宁所指出的，有“中国社会关系的辯証法”，这就是說，中国近代社会要求冲破封建主义的束縛，但在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中国，在突破封建主义束縛后，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而紧接着要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摆在人們的面前，必須解决中国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相互联系的問題；这一重大的历史課題，只有在工人阶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武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才能正确地解决。

在中国共产党的領導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我們懂得了走向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具体道路，懂得了不断革命論与革命阶段論的統一。毛澤东同志很早就指出，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革命阶段是不能混同的。“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一个革命过程”<sup>⑥</sup>。另一方面，这两个革命阶段之間并不隔有一道万里长城，它們是互相联系的。毛澤东同志說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为了終結殖民地、半殖民地、

① “毛澤东选集”，第2卷，第671頁。

② “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資料簡編”，第1259—1260頁。

③ 見“战后之世界潮流”及“劳动教育問題”。

④ “毛澤东选集”，第2卷，第618頁。

⑤ “論人民民主专政”。

⑥ “毛澤东选集”，第2卷，第622頁。



半封建社会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間的一个过渡阶段。”<sup>①</sup>

由“五四”开其端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1949年取得了胜利，也就在这个时候，开始了新的革命阶段——

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飞跃发展的生动事例，证明了党的领导是我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根本保证。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8页。

## 动态

## 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工作近况

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全体研究人员和一部分行政工作人员自今年1月份起，除一小部分根据该所1959年工作计划，继续在北京宣武区椿树胡同人民公社、海淀区玉渊潭人民公社，进行调查并参加整社外，其余已全力投入了“法学基本知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年来的法学研究工作”两书的编写工作。

“法学基本知识”的编写工作是今年1月初开始的。1月中旬拟出了提纲。现该书初稿已全部写好，正在分送各有关同志征求意见中。

根据提纲，该书除“前言”外，共分六章。第一章写法的产生，法的本质，法的历史类型以及我国的“法”有那些特点和作用等。第二章宪法，叙述宪法的本质和历史类型，以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的本质区别，我国宪法的特点等。第三章刑法，主要谈：刑法的本质和任务，刑法的产生和发展，犯罪的阶级性和原因，刑罚的本质和作用以及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基本政策等。第四章民法，主要谈：民法的本质、作用，我国的民事政策和民事法规，所有权，债权和继承权，合同以及婚姻和家庭等。第五章劳动法，谈劳动的本质，我国的劳动政策和劳动法规，劳动管理，劳动纪律，劳动保护，工资和劳动保险等。第六章审判法，谈审判法的本质和作用，我国审判法的基本原则和诉讼程序等。

此外，这个编写小组在写“法学基本知识”的同时，还拟出了“宪法基本知识”一书的提纲（草稿），他们准备在“法学基本知识”一书定稿后，立即开始“宪法基本知识”的编写工作。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年来的法学研究工作”一书的编写工作，在1958年12月25日由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研究部和法学研究所共同组织的会议上，初步交换了意见。今年1月间经过正式讨论，通过了该书的提纲（草稿），并确定以法学研究所为主，会同中央政法干校、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律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及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等有关单位共同组织力量着手编写。

（佟明辉）

## 坚决支援古巴、刚果、喀麦隆 人民的反帝斗争

何 戊 双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各界人民，于1959年1月25日隆重举行集会，代表全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热烈庆贺古巴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并向英勇奋斗的刚果人民致以兄弟的热烈的敬意。2月18日，中国人民又举行了“喀麦隆日”，声援正在为了祖国的统一独立和自由进行着英勇斗争的喀麦隆人民。

中国人民高兴地看到，近几年来，非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有了空前蓬勃的发展，并且不断取得新的胜利。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近年来同样不断高涨，已日益形成燎原之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古巴人民具有反抗压迫和奴役的光荣传统。许多年来，古巴人民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掠夺，反对巴蒂斯塔卖国独裁政权，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如今，坚持斗争的古巴人民在卡斯特罗领导下，终于推翻了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巴蒂斯塔政权，取得了胜利。这是古巴人民，也是拉丁美洲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反对独裁统治的又一伟大胜利。

古巴临时政府成立后，宣布恢复对出版自由、工人权利的宪法保证，解散旧议会，解除前独裁政权的省、市长职务，并审判巴蒂斯塔余党，使美国垄断资本控制的古巴公用事业遵守古巴政府的管理，这些措施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

古巴局势渐趋稳定之后，美国虽然被迫

承认了临时政府，但当巴蒂斯塔罪犯被惩治的时候，美帝国主义者就打起“人道主义”的招牌大叫大喊起来，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鲁博特姆竟然说要“古巴当局考虑美国的舆论”；这种明目张胆的干涉古巴内政其目的显然是为了保存巴蒂斯塔的余党，以便将来内应外合恢复古巴临时政府，使代表美国垄断资本利益的独裁政权复辟。

事实十分明显，美帝国主义者不管是为了经济利益还是为了“战略需要”，都是不会轻易放弃对古巴的控制的。尽管美帝国主义者再三佯称“不干涉古巴内政”，但这丝毫未能掩盖它的侵略本质，古巴人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了美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美帝国主义者的横暴干涉，激起了古巴人民无比的愤怒。1月21日，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了一百万群众大示威，严厉谴责美国横蛮干涉古巴内政，古巴武装部队总司令宣布“古巴不但要求政治上的自由，而且也要求经济上的自由”，古巴将要“修改和废除给予外国企业的各种特权”，这鲜明地表达了古巴人民保卫革命胜利果实，争取独立、自由、民主的决心，有力地回击了美帝国主义的挑衅。

应当指出，美帝国主义对古巴内政的干涉，不仅严重地侵犯了古巴人民的主权权利，而且也粗暴地破坏了现代国际法。不干涉内政，这是举世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准则之一。根据这项原则，各国人民完全有权利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决定自己的命运，自由选择他们自己合意的政府形式和生活方式，任



何外国不得以任何借口进行干涉。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象美国今天这样在全世界这么多地方用各种借口和各种手段干涉别国的内政。美国这种违反和破坏国际法的行为，不能不引起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的反对。

古巴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独裁统治的英勇斗争及其取得的胜利，不但是对拉丁美洲民族革命运动，而且是对亚洲、非洲民族革命运动一个很大的鼓舞。

最近爆发的刚果人民反对殖民统治的群众性斗争，是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一个重大发展。八十年来，比利时殖民统治者对刚果进行了极端残暴的掠夺。刚果人民被强迫定期交纳定量的橡胶和象牙，如不能达到定额就受到截肢或枪决的惩罚。二次大战后，美国资本大量渗入比利时在刚果的企业，这更加深了刚果人民的灾难。在比利时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极端残酷地掠夺、剥削和奴役之下，刚果人民过着极其悲惨和贫困的生活。八十年来，刚果人民曾进行过多次反殖民主义的斗争。现在，在社会主义力量空前强大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下，当古巴人民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后，刚果的首府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殖民主义的暴动。尽管比利时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实行血腥的镇压和阴谋欺骗，但是，刚果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坚强意志，是不可动摇的。刚果人民的斗争，决不是孤立的。我们深信，坚持斗争的刚果人民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同时刚果人民的英勇斗争，必将推动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进一步高涨。

比利时殖民统治者对刚果人民的镇压和屠杀，不仅野蛮地践踏了刚果人民的民族权利，而且也严重地违反了现代国际法关于民族自决的原则。1955年亚非会议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指出：“自决的权利必须为一切人民所享有，自由和独立必须尽可能不延迟地给予现在仍旧是附属地人民的人

们。”殖民主义者没有任何理由和任何办法可以制止殖民地国家取得独立。

目前，整个非洲大陆，从好望角到丹吉尔，从大西洋沿岸到印度洋沿岸，民族解放的熊熊烈火到处燃烧起来了。喀麦隆人民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争取统一、独立和自由的斗争越来越高涨。

远在公元七世纪，喀麦隆就曾经建立过经济上和文化上相当发达的国家。十五世纪末，葡萄牙人首先侵入了喀麦隆。十七世纪初，荷兰和英国相继侵入。十九世纪中叶，德国迫使土著国王签订了吞并条约，1884年，德国正式宣布喀麦隆为它的保护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殖民者又瓜分了喀麦隆。一直到今天，喀麦隆仍然受着英法殖民国家的所谓“托管”统治，而不得独立。喀麦隆有很丰富的物产，但是由于长期处于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下，使它沦为一个极端落后的农业国。在殖民主义者残酷地掠夺和奴役之下，五百万喀麦隆人民和迄今仍处在外国殖民统治下的一亿四千万非洲人民一样，仍然过着奴隶般的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不应允许这种状况存在下去，喀麦隆人民和非洲人民完全有权利要求结束罪恶的殖民制度，而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认为帝国主义强盗自封的“托管制度”必须立即结束。

喀麦隆人民为了争取民族自由，争取国家的统一和独立，长期以来，一直进行着顽强的斗争。特别是自从1948年诞生了爱国政党喀麦隆人民联盟以后，喀麦隆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尽管法国殖民者在喀麦隆进行了象1955年的大屠杀，宣布喀麦隆人民联盟“非法”，但是，喀麦隆人民在喀麦隆人民联盟的领导下展开了抗击法国殖民者的武装斗争。三年以来，人民武装力量已经从几百人扩大到好几万人，游击地区也从喀麦隆的西部逐渐向北蔓延。可以断言，法英殖民者任何镇压或欺骗手段，都不能阻止喀麦隆人民争取独立自由的正义斗争取得最后

胜利。

事实一再証明：在我們的时代里，为独立而斗争的民族，只要在国内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再加上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就一定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略。許多的民族独立运动說明了，保持国内的一切爱国民主力量的团结，是战胜帝国主义的重要条件。无数事实証明：各种爱国民主力量团结得越广泛，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就越有胜利的把握。任何一个民族，只要能够把全体人民群众的力量团结起来，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下，联合世界上一切反帝国主义的力量共同奋斗，就一定立于不败之地。

社会主义力量的增长，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和壮大及其对民族独立运动的同情和支持，大大便利了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和胜利。同时，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民族独立国家的兴起和发展，也削弱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有利于世界和平事业，因而也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建設。根据社会主义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相互支持的思想，社会主义国家一向同情并积极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侵略的国家反对殖民主义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援是民族独立运动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中国人民曾經长期受帝国主义的压迫，美帝国主义至今还霸占着我国的台湾，因此，我們对于正在进行反帝斗争的古巴人民、刚

果人民和喀麦隆人民，寄予无限的同情，并予以全力支持。中国人民曾經长期同帝国主义进行艰苦的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从我們的切身体驗中，我們深知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紙老虎。它們外强中干，欺軟怕硬。受压迫的人民，只要团结起来，坚持斗争，就一定会取得胜利。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革命运动，已經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已經土崩瓦解。当然，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們正在而且必将繼續对民族革命运动进行镇压和破坏，他們尤其害怕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对于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持以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团结，因此，他們竭力挑拨社会主义国家同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国家之间的关系，竭力破坏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国家之间的团结和这些国家内部的团结。在争取民族革命彻底胜利的道路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还会遇到許多困难和曲折。但是，我們深信，觉悟了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在强大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下，在全世界主持正义的国家和劳动人民的支持下，一定能够紧密团结起来，坚持斗争，坚决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彻底粉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阴谋。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古巴人民、刚果人民和喀麦隆人民！





##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总書記 諾尔曼致各分会書記的信

亲爱的朋友們：

越南法律工作者协会曾就1958年12月1日在南越富利集中营发生的一千多个政治犯中毒死亡的惨案向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发出呼吁書。

沒有被毒死的人当时曾大声呼喊，而集中营当局竟报之以暴力，向他們开火，并縱火焚毁了部分的营房，从而杀害了更多的政治犯。

越南法律工作者正在抗議这桩集体屠杀案件，因为它不仅罪恶地侵犯了最基本的人权，而且粗暴地破坏了日内瓦協議中的第十四条第丙款关于禁止对个人或組織因他們在战争时期的活动而采取任何形式的歧視或报复的規定。

越南法律工作者协会要求大家向国际监督和監察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加拿大、印度和波兰的成員組成）提出控告，以便取得：

- 对这桩案件进行調查；
- 公布受难者和幸存者的全部名单；
- 对幸存者进行援救。

这个事件涉及到就越南問題签订日内瓦協議的国家的責任問題，也涉及到負有监督这些協議执行的国家的責任問題。它說明了由于不尊重国际協議而在越南造成的那种局势的严重性，也說明了严格履行日内瓦協議的条款以消除在这个国家里出現的紧张局面的迫切必要性。

我們深信，国际民主法协所屬的各个組織将采取他們認為适当的各种行动来响应越南法律工作者的呼吁：

- 保証在富利发生的万恶事件将交付公众进行詳細审查；
- 促請受日内瓦協議約束的国家注意有必要竭尽全力来履行全部日内瓦協議。

国际民主法协書記处已經向越南国际监督和監察委员会的委員、签订日内瓦協議的各国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了建議。他們还将繼續要求对这桩案件进行調查，并将調查結果公布。

你誠摯的

总書記：諾尔曼

1959年2月11日

于布魯塞爾

## 抗議南越吳庭艷集團的滔天罪行

1959年1月18日，越南人民軍總司令武元甲大將給越南國際監督和監察委員會主席安薩里一份緊急電報，強烈抗議南越當局大規模屠殺政治犯的嚴重罪行。電報中揭露：設在南越土龍木省的富利集中營，經常禁閉着大約六千名政治犯。1958年12月1日，南越當局在飯里放下毒藥，殺害了其中一千多人。這一駭人聽聞的暴行，是世界上少有的，其殘暴的程度簡直同當年希特勒匪徒大規模屠殺戰俘及和平居民一樣。這種暴行，完全違反了人道主義原則，蹂躪了基本人權，遭到了全世界有正義感的人民的一致譴責。

南越當局大規模屠殺政治犯，不但違反了人道主義原則，蹂躪了基本人權，而且，粗暴地破壞了日內瓦協議。越南停止敵對行動協定第十四條丙款規定：“各方約定，不因個人或團體在敵對行動期間的活動而對其加以任何報復和歧視，並保障其民主自由。”日內瓦會議最後宣言第九條規定：“越南南北兩地區有代表性的負責當局，以及老撾和柬埔寨的當局，不得對戰時曾以任何方式與對方合作的人員或其家屬加以個別或集體的報復。”

日內瓦會議是一次重要的國際會議，參加關於印度支那問題的會議的有蘇聯、中華人民共和國、越南民主共和國、美國、英國、法國、老撾、柬埔寨和南越。會議所通過的協定是對於遠東和平具有重大意義的國際協定，它對緩和當時的國際局勢和保卫遠東和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的貢獻。毫無疑問，所有與會國家都應該嚴格履行日內瓦會議達成的各項協議。並且，與會各國有義務和責任對破壞協議的任何國家或集團進行制裁。關於這一點，日內瓦會議最後宣言有明確的規

定。該宣言第十三條指出：“與會各國同意就國際監督和監察委員會向他們提出的任何問題彼此進行協商，以便研究為保證柬埔寨、老撾和越南的停止敵對行動協定被尊重所必需的措施。”

必須指出：南越當局違反日內瓦協議決不是偶然的。從印度支那恢復和平之日起，就一再阻止日內瓦協議的執行，如一直拒絕參加聯合委員會，違反關於非軍事區的條款，阻撓越南國際監督和監察委員會的監督活動，拖延自由普選的進行，特別是一貫迫害要求民主、自由的愛國者，在國內實行殘酷的法西斯統治。據不完全的統計，自從越南停戰起到1957年11月間，吳庭艷集團在南越各地製造了恐怖事件六千一百七十二起，殺害前抗戰人員二千二百九十三人。越南國際監督和監察委員會在1958年7月5日向日內瓦會議兩位主席提出的第八次臨時報告中指出：在報告期間，越南人民軍總司令部先後八十七次指控南越當局違反越南停止敵對行動協定第十四條丙款的規定。委員會已經確定了南越當局在十四個案件中違反了協議，並且要求釋放受害人員，但是，南越當局拒不執行。因此，南越當局破壞日內瓦協議是一貫的。富利慘案的发生，再一次證明南越當局繼續破壞日內瓦協議的罪惡行為，並且發展到了極為瘋狂的程度。

應該特別指出：南越當局瘋狂地破壞日內瓦協議，鎮壓和集體屠殺愛國者，是得到美帝國主義積極支持的。大家知道，近年來，美國一直控制着南越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各个方面，並把南越置於東南亞侵略集團的“保護”之下，在南越建立軍事基地，運進軍事物



資。現在，两千多名美国軍事顧問掌握着南越軍隊的建設、教練、指揮、修建基地和战略公路等各方面的一切大权。“美国公务代表团”深入控制南越政府的各个部門。因此，吳庭艳集团在南越的暴行，显然是在美国的直接策划和支持下干出来的。据报导，富利集中营中的有些特务人員曾在美国受过專門訓練，这次惨案的罪魁，集中营的中尉副典獄官胡文晋，就是不久前从美国回来的。惨案发生后，美国軍事顧問团团长塞繆尔·威廉斯曾指揮南越軍隊包围附近地区，镇压当地人民援救爱国者的斗争。这些事实，充分說明了美帝国主义者富利大屠杀事件中扮演了一个怎样丑恶的角色！美国这样的支持和策动南越当局镇压爱国者，制造大屠杀事件，其目的在于镇压南越人民对反动的南越当局的反抗，阻挠越南的統一，把南越完全变成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軍事基地和殖民地，进一步对印度支那地区进行放肆的干涉。

目前，尽管南越当局对其所犯的罪行进行无耻的抵賴，并且为了掩盖罪行和消灭罪証，在美国的授意下，进行了各种偷天換日的活动，如将原来囚禁在富利集中营的政治犯調往別处，然后把一些伪装作政治犯的特务安插到集中营里，阴谋在越南国际监督和監察委员会前往調查时，进行掩飾和抵賴。但是，在鉄的事实面前，无论怎样抵賴，屠杀的

罪責是逃避不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已經向全世界揭露了这一事件的真相，越南各地到处举行游行示威，抗議南越当局的法西斯暴行，这种抗議行动并已形成了越南历史上空前規模的群众示威运动。我国各阶层人民和全世界各国輿論也都一致支持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譴責南越当局的暴行。我国“人民日报”并于1959年1月21日发表社論，对南越当局的暴行表示了最强烈的抗議。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波兰、羅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蒙古、印度以及印度尼西亚、英国、日本等国的人民和輿論一致要求調查富利惨案，并立即释放那些为自由而斗争的爱国战士。

越南人民反对富利大屠杀的斗争，同样也是反对南越当局及其主子美帝国主义阴谋破坏日内瓦協議、阻挠越南統一的斗争。我們認為作为监督日内瓦協議在越南实施的越南国际监督和監察委员会应该切实履行自己的責任，立即采取措施，并就富利大屠杀事件进行現場調查，提出詳細的报告加以公布。我們希望全世界的法律工作者响应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总書記諾尔曼和越南法律工作者协会的呼吁，立即行动起来，支持越南人民的斗争。

(1959年3月7日)



##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通告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書記处提請希腊政府和政界人士注意：馬諾里·格列索斯 (MANOLIS GLAZOS) 这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希腊抗战英雄現以間諜罪名被逮捕一事，已引起世界法律界的忧虑。这种作法引起了在希腊适用特別法所造成的危害。而这种特別法的合法性甚至希腊自己的法律界輿論也是反对的。

書記处代表各种观点的法律工作者表示希望看到馬諾里·格列索斯由正規法庭依照希腊刑法典进行审理。

1958年12月22日于布魯塞爾

### 評論

## 抗議希腊当局迫害 馬諾里·格列索斯

中国法律工作者十分关切地注意到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書記处于1958年12月22日发出的一項通告。該項通告告知我們，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一位希腊抗战英雄馬諾里·格列索斯 (MANOLIS GLAZOS) 已被希腊政府加誣“間諜活动”罪名逮捕。国际民主法協書記处在通告中庄重表示：这一事件“已引起世界法律界的忧虑”。通告提請人們注意：希腊政府的“这种作法，引起了在希腊适用特別法所造成的危害。而这种特別法的合法性甚至希腊自己的法律界輿論也是反对的”。

希腊当局的这一暴行，已激起希腊和全世界主张正义的人士的强烈抗議。希腊許多社会人士都对格列索斯受到的迫害表示憤慨，強調指出对他的控訴是荒謬的。甚至连希腊前首相曹达利斯也在說：“在对格列索斯

的控告中沒有一个字是真話”。希腊議会的議員們反对这一誣告，并要求废除用来迫害格列索斯的反动的法律。在全世界营救格列索斯的国际性运动正在繼續开展。据希腊“黎明日报”指出，由于全世界許多享有极大威望的团体和活动家的齐声抗議，已使希腊当局处于狼狽境地。

中国法律工作者对于希腊統治者迫害希腊爱国者的行为并不是生疏的。中国法律工作者在自己的記憶中，还清晰地記得希腊法律工作者出席“国际法律工作者保卫民主自由會議”的代表团在那次會議上报告的关于希腊政府严重侵害人身的安全和人身安全的保障，破坏法制的許多实例。当时，在庄严的會議中，中国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和其他各国法律工作者的代表在一起通过決議，对希腊发生的这种情况表示了抗議。



中国法律工作者对于又一次在希腊发生的这种严重侵害希腊爱国人士人身安全和人身安全保障的事件，深表愤慨。中国法律工作者坚决支持国际民主法协在通告中所作的

表示，并认为希腊当局的这种迫害希腊爱国者的暴行完全是违犯人权的，并且是非法的；希腊当局应当立即释放馬諾里·格列索斯。

## 动态

### 北京大学法律系教学科学研究动态

为了贯彻北大校党委提出“苦战三年，基本上把北大建成先进的共产主义新北大”的口号，法律系师生在教学、科学研究和生产劳动三结合运动中，在党总支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鸣放、辩论，先后提出二十多个方案，经过反复地讨论修改，最近制定出了新的教学改革方案。

这个教学改革方案是根据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结合法律系具体情况而制定的。

根据新的教学改革方案精神，法律系党组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贯彻。去年12月份，法律系全体师生下放，一、二年级到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人民公社进行边工边读，并结合社会调查开展科学研究。三、四年级下放到河南，分别到禹县和长葛等地，以参加基层工作和进行科学研究为主，适当地参加劳动生产和进行教学活动，即边工作、边学习、边劳动、边调查、边研究。目前，他们在工作、学习和思想方面都已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目前，大部分教师已经抽回系里，进行紧张的备课工作。在进行备课工作的同时，还结合本门业务有关专题进行科学研究。如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理论、人民民主法制理论、政社合一问题等。要求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和提高讲课质量。目前，部分教师还参加了关于资产阶级法学的批判工作。大家都满怀信心，干劲十足，争取以更多更好的成绩来迎接伟大的“七一”、“十一”，作为向党的献礼。

(平)

# 人民公社的出現标志着我国基层政权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国家法教研室集体写作

我們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各种组织来实现的。我国各级政权机关，是执行党的政策，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职能的强大工具。在国家权力机关的体系中，基层政权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是由于它们直接领导着农村的劳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的经济与文化建设工作，直接地把党的各项政策贯彻到群众中去，并直接地执行着对阶级敌人专政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任务。

我国基层政权，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组织形式是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相适应的。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政权的组织形式必然要有相应的变化。

1956年以前，乡政权是单一的政权组织，虽然乡政权一建立就执行着组织经济文化教育的职能，但由于具体条件所决定，乡政权与农村的经济组织不可能合而为一。我国革命政权建立的初期，基层政权的具体任务，是镇压反革命分子和已被推翻的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反抗，全面地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大力恢复国民经济，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准备必要的条件。在完成了土地改革以后，积极地着手改造农村个体经济的落后面貌，使其成为

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堵塞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这是发展农业生产，改造国民经济的重要前提。

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普遍建立，农村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本废除，广大农民树立起了“以社为家”的思想，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就逐渐地成为农民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的主要场所，而乡政权的工作一般都通过各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紧密结合生产贯彻执行。这样，农业生产合作社便承担起了乡人民委员会委托的许多行政任务。农业生产合作社及其生产队，实际上代替了乡人民委员会以下的行政组织（如行政村、居民组等）。乡的各种工作委员会和农业合作社的有关组织，在组成人员上、在具体任务上也结合了起来。在有些并小社为大社，实现了一乡一社的地方，乡社干部相互兼职，两个牌子，一套人马，事实上就已经出现了政社合一的过渡形态。

1958年在我国出现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工农业生产全面大跃进。工农业生产的高涨，原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在生产和思想不断跃进的基础上，我国农民自动地创造了人民公社这一加速社会主义建设、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组织形式。去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在



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人民公社运动就在全國範圍內普遍展開了。

从单一的政权組織和单一的經濟組織发展成为人民公社，不仅是規模的扩大，而且所包括的內容、性質和范围也不同了。人民公社最基本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全面結合。既是我国社会結構的基层单位，又是政权組織的基层单位。我国社会經濟全面的綜合的发展，标志着：我們国家政权对内直接組織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职能大大加强了，今后将日益加强。政社合一，对于生产建設和政权工作实行統一領導，使我国基层政权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 二

政权組織与农业生产合作社合而为一，并不意味着改变了我国基层政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質，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恰恰相反，政社合一以后，我国基层政权的組織經濟和文化教育的职能更加发展和加强了，对敌人专政的威力也更加强大了，而且直接管理人民的生活福利，已成为我国基层政权的重要活动。

社会主义国家具有資本主义国家所根本不可能有的組織經濟与文化教育的职能。我們党在“再論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領導的国家，領導人民群众有計劃地发展社会主义經濟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公社化以前，乡政权就已經成为我們国家組織經濟与文化教育职能的直接体现者，它一直以自己的創造性的活动为发展社会主义經濟与文化而努力。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乡政权在管理經濟方面的作用还受到一定的限制。如今，政社合一了，我国基层政权实现了經濟領導与政治領導的統一，人民公社成了人民生产的組織者，它依据着統一領導、分級管理的制度，管理着公

社範圍內的工农业生产和其它的財經工作。

人民公社的組織經濟职能的加强，最显著的表现是：第一、人民公社对于劳动力和生产資料可以在較大的範圍內作統一的安排和計劃，比以前得到更合理、更有效的使用，从而更便于发展生产。第二、人民公社是大型的綜合性的經濟組織，农林牧副漁五业，在公社的統一領導下得到了密切的結合和迅速的发展，根据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确定的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針，公社办起了小工厂，这样就使得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得到了密切而有机的結合。人民公社統一領導各項生产的重大意义，还在于公社根据发展国民經济的各种比例关系，使社会主义的經濟在相互配合下得到迅速而全面的发展。第三、人民公社把各項生产納入了国家計劃的軌道，集体所有制的經濟增加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逐步地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創造了有利的条件。

政社合一以后，我国农村在生产大发展的同时，文化教育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随着公社的发展，以后还将有更大的发展。

对敌人实行专政，是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一件极其严肃的重大政治任务。現在我們面临着一个深刻的社会变革，在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深刻变革中，必然会引起新的复杂的階級斗争的出現。正如党在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所指出的：“复杂的階級斗争，不但在国外，在資本主义世界，严重地存在着；就是在国内，也还是存在着”。因此，人民公社建立后，我国基层政权組織經濟和文化教育职能的加强，并不意味着专政职能的削弱，恰恰相反，政社合一以后，事实証明，我国基层政权在对敌专政方面的职能是在加强了。

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公社成为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全面結合的統一體。在公社党委的統一領導下，各方面的力量紧紧地

擰成了一股繩，更加增強了基層政權對敵人實行專政的威力。

政社合一使我國社會主義民主進一步擴大和愈來愈廣泛。公社的社員群眾更直接地參加了各項社會主義事業的管理，特別是廣大的貧農和下中農這些公社的堅決擁護者被吸收到公社的各級管理組織中來做領導骨幹，這樣，不僅進一步發揮了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而且保證了公社領導核心的純潔性。

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生產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滿足全體社會成員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關心群眾的生活，這一向是我國人民政權的重要任務。過去，鄉政權在進行優撫救災方面，和在舉辦群眾性的福利事業等各个方面，做了許多工作。現在，我國基層政權更直接地擔負起了組織群眾生活的任務。人民公社是人民的生產的組織者，也是人民的生活的組織者。人民公社根據工農業生產大躍進和廣大社員的迫切要求，創辦了大量的公共食堂、托兒所、幼兒園、敬老院、縫紉組等集體福利事業。在發展生產的前提下，人民公社還將逐步改善現有的居住條件，分期分批地建設新型的園林化的鄉鎮和村的居民點。群眾衛生事業（診療所、助產院等）也有了很大的發展，這就進一步增強了我國勞動者健康的物質條件。

黨的八屆六中全會在“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明確地指出“办好人民公社的根本問題是加強黨的領導”。只有在黨的統一領導下，我們的事業才能不斷前進、不斷勝利，這是被過去和現在的實踐千百次證明了的。人民公社建立以後，黨在政治領導、組織領導和思想領導方面更進一步地加強了。政社合一也為進一步加強黨的領導提供了更為有利的條件。

### 三

我國基層政權的體制和機構，是適應着

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性質而建立的，是實現無產階級專政職能的組織形式及其方法的具体運用。這種組織形式是隨着鬥爭形式和政治任務的變化而變化的。人民公社的建立，在我國各方面引起了一系列巨大而又深刻的變化，自然也給我們提出了調整原有鄉政權的組織形式和組織機構的問題。

一、各地人民公社在建立的時候，一般都根據政社合一的原則，肯定了社員代表大會是公社的最高權力機關，同時也是我國最基層的地方國家權力機關（即鄉人民代表大會）。公社社員代表大會的代表，按照我國選舉制度所確定的民主原則由社員直接選舉產生。社員代表大會有着廣泛的代表性，它包括了各個生產隊和各個方面的代表人物。公社的正副社長、管理委員、各大隊的正副隊長、委員、生產隊長等，均由社員代表中選舉產生。公社的各級領導工作人員大多數是社員代表。這樣，不僅加強了社員代表大會的工作，而且更便於公社的各級領導工作人員廣泛地聽取群眾的反映和意見，正確的和及時的貫徹執行社員代表大會的決議。

由於人民公社舉辦了公共食堂、托兒所、幼兒園、縫紉組等集體福利事業，這就使得幾千年來屈伏在鍋灶旁邊的婦女得到了徹底的解放，直接參加了社會勞動。婦女徹底解放，這樣輝煌的事實也反映到我國的代表選舉上。在各地人民公社社員代表大會代表的總人數中，婦女代表的比例數有了迅速的增長，一般已達到20%左右。

選舉權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這是我國選舉制度的人民民主專政本質的集中表現。各地人民公社的章程從人民民主專政的這一本質出發，規定凡年滿十八歲的勞動人民，不分性別、民族、職業、社會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除有精神病的以外都有選舉權、被選舉權、表決權和監督社務的權利。這表現了我國公社社員代表大會選舉制度的最大限度的普遍性。公社中過去的地主



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其他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经过群众讨论仍不够作为社员的，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社员代表的任期为二年，对于极不称职的个别代表，在其任期未滿以前，原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随时撤换。

人民公社是我国地方政权组织的基层单位，同时又是综合性的大型经济组织。人民公社的这一性质，使得社员代表大会比过去的地方基层政权具有更为广泛的职权。社员代表大会在其管辖的区域内除了行使过去基层政权的职权外，由于人民公社是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的组织者，社员代表大会还具有直接的管理生产、分配和社内生活福利事业的职权。

社员代表大会是通过会议进行工作的，根据农村生产的季节性的特点，社员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二至三次，遇有重大事项时可以临时召开。

二、适应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情况的变化，人民公社的管理机构也比过去的乡政权的管理机构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人民公社的管理机构的发展，更加深入地贯彻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人民公社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公社的管理机构，一般分为公社管理委员会、管理区（或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

调整建立新的体制和机构是办好人民公社的组织基础。在建立新的体制和机构时，我们认为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从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出发，保证党的统一集中领导，充分发挥各级管理机构的积极性；

（2）从有利领导出发，机构力求精简，减少层次，加强第一线 and 薄弱区，保证领导核心的纯洁；

（3）从有利生产出发，尽量照顾原有的干部基础，根据工作的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使干部人尽其才；

（4）从当前现状出发，对可设可不设的机构不设，能合起来的就合起来。

三、人民公社的职能与组织机构的发展，领导机关必须实行与此相适应的领导方法。适应着人民公社的性质与特点，公社在生产管理方面，在收入分配方面，在社员生活福利工作方面，应该全面地抓思想、抓生产、抓生活，应该服从国家统一计划和因地制宜的原则，应该坚持勤俭办社的原则，应该实行生产责任制，应该实行民主管理化的原则。

在我国公社管理工作中所贯彻的上述几项基本原则，都是以党的政策为基础，因此，在执行过程中必须全面结合，作为一个统一的基本指导思想。

全国农村公社化以后基层政权体制和机构上的变化，必然要求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执行机关县人民委员会有相适应的改变，以便上下贯通易于组织领导各项工作。因此，建立县联社，已成为人民公社化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趋势。



# 从一个公社看人民公社的优越性

北京市海淀区东升人民公社 許醒亚 潘华仿

党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说：“一九五八年，一种新的社会组织象初升的太阳一样，在亚洲东部的广阔的地平线上出现了，这就是我国农村中的大规模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它一出现，就以它的强大的生命力，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人民公社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因为：它是我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产物，它的产生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和群众的迫切愿望。北京市西郊东升人民公社的诞生过程以及它在诞生以后短短的几个月中所发挥出来的威力，完全说明了这点。

在1958年春天以前，东升人民公社的辖区内，原有九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最小的一个社只有100多户，劳动力150余个，耕地600余亩；最大的一个社也只有500多户，劳动力800余个，耕地5000余亩。1957年下半年，首都郊区的农民经过全民整风运动、两条道路的辩论，进一步摆脱了富裕中农的思想影响；他们并且讨论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为农村发展的远景所鼓舞，纷纷提出了“跨黄河”、“过长江”的英雄口号，并以冲天的干劲，不畏严寒，展开了大规模的基本农田建设，打井、开渠、兴修水库，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冬季水利建设高潮。水利建设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打一眼电井就需要投资10000余元，2400个人工，这不是一个几百户的小社所能办到的，而且水利建设的规划，往往涉及到几个社的管界，这就需要打破社界，在较大的范围内统一计划人力、物力和财力，于是就明显地暴露出原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到1958年夏天，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照耀下，北京郊区的农民和全国农民一样，进一步解放了思想，要求尽快地发展农业，兴办工业和各种文教卫生事业，以迅速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这必然就要求在较大的

范围内，统一计划人力、物力和财力，原有的农业合作社的规模，同生产力猛烈发展的矛盾，就暴露得更加突出，就在这种形势之下，出现了并大社、转公社的运动。在1958年春天，原来的九个农业社就合并成为北太平庄、五道口、大钟寺三个农业社，接着在八月底，上述三个农业社就转变成为现在的东升人民公社。公社共有社员2827户，12768人，劳动力4748个，耕地18000余亩。它和原来的农业社比较起来，不仅规模大，而且经营的范围也广得多，它已不是单一的农业生产组织，而是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政社合一的社会基层单位。

## 二

从上面简单的叙述就可以看出，人民公社的成立，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样一个客观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是群众自觉的创造。党和毛主席热烈支持群众的这种创举，并及时地加以诱导、概括和提高，在人民公社化群众运动一定的阶段，制定一定的方针、政策和步骤，促进运动的健康发展。

不仅是人民公社产生的过程反映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群众的迫切愿望，而且人民公社在成立以后的短短几个月中，所显示出来的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更加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我社在成立以后，马上就投入紧张的“三秋”（秋收秋耕和秋种）运动和全民炼钢运动。以秋种来说，完全改变了过去广种薄收的局面。去年我社种植小麦3376亩，其中95%深翻达1.5尺以上，试验田深翻达5尺左右，每亩平均施肥5万斤，实行了合理密植，作到了麦地园田化，为今年的小麦丰收打下了基础。在播种小麦以后，我社又紧接着完成了深翻和普耕秋茬地11000余亩的任务。与此同时，完成了700多万斤粮食和将近60万斤籽棉等农作物的秋收工作。还兴办了轴承厂、大车厂、农具厂、粮食加工厂、制醋厂等九个小工厂。应该指出，这些繁忙的任务基本上是靠人力和畜力，并在抽出了



20%的壯劳动力投入煉鋼運動和大力支援密云水庫和國家的工業建設的情況下完成的。

為了完成這樣繁忙的生產任務，就要求進一步解放劳动力，消除束縛社會生產力的因素，而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的家務勞動，却耗費了大量的劳动力。我社2827戶，每戶平均以半個劳动力從事家務勞動計算，就占用了1400多個劳动力。於是人們感到，為了解放劳动力，必須使家務勞動集體化、社會化。就在這種形勢之下，群眾提出了食堂化、托兒化、縫紉機器化的要求，成立了食堂55個，托兒所、幼兒園63個，縫紉廠（組）23個。在這些服務性的部門中工作的人員，總共為576名。由於實行家務勞動集體化、社會化，解放出了將近1000個劳动力，其中絕大多數是婦女劳动力。恩格斯早已指出以家庭為單位進行家務勞動對劳动力的浪費，並且指出：“可以大膽地假設，有了公共食堂和公共服務所，從事這一工作的三分之二的人就會很容易地解放出來，而其餘的三分之一也能够比現在更好、更專心地完成自己的工作”<sup>①</sup>。我社的實踐，完全証實了恩格斯的設想。由於實行家務勞動集體化、社會化，不僅使廣大的婦女從繁瑣的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發揮她們的聰明才智，參加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就是在服務性部門中工作的人員，雖然還是從事做飯、帶孩子、縫衣服等等勞動，但這些人的經濟地位和社会地位，已和過去大不相同了。過去從事家務勞動的婦女，由於她們陷在家庭範圍以內的圈子裡，不能從事生產勞動，往往陷入一種依賴和近於閉塞的境地；而現在在集體化、社會化的服務性部門中工作的人員，她們是公社的工作人員，過着集體化的勞動生活、政治生活和学习生活，她們也能够在勞動技術上、政治上和文化上，和其他的社員一樣，得到廣泛發展的機會，使她們熱愛自己的工作，不斷地改進自己的工作。總之，家務勞動的集體化和社会化，使千百年來屈伏在“炕台、鍋台、磨台”上的婦女得到了徹底的解放，使生產戰綫上增加了一支極為重要的力量。

為了完成緊張的“三秋”任務並積極開展全民煉鋼運動，不僅要求進一步解放劳动力，而且還要求實行大協作，提高勞動生產率。當時，為了在“秋分”以前種完小麥，並在地凍以前把秋茬地深耕、普耕一遍，於是實行了必要的勞動大協作，因而按照農業季節的要求，及時完成上述任務；要是沒有實行公社化，使劳动力和生產資料在較大的範圍內作

必要的統一的調度和安排，那是非常困難的。

生產高潮促進了文化高潮。為了滿足生產發展的需要，群眾迫切要求學習文化和技術知識，在勞動相當緊張的情況之下，群眾仍然擠出時間來學文化、學技術。我社開辦了業餘學校和紅專學校38所，入學人數1019人；參加掃盲識字班學習的人更多，有2000多人經過學習後，摘掉了文盲帽子。從我們在生产戰綫上和文化戰綫上已經取得的成績和群眾的革命干劲可以看出，人民公社促進了生產的發展，提高了群眾的文化水平。它的成立，反映了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和群眾的迫切願望。

### 三

由農業社轉變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使生產資料和劳动力組織集體化的程度提高了，這樣，便于代表全體人民的國家基層政權機關，直接領導集體經濟組織，根據國家計劃和整個國民經濟的需要，發展生產。在黨的決議中指出，“人民公社發展生產的正確方針應當是：根據國家統一計劃和因地制宜的原則，根據勤儉辦社的原則，實行工業和農業同時並舉，自給性生產和商品性生產同時並舉”。東升人民公社，位於首都近郊，肥源足，土質好，有發展蔬菜生產和畜牧業生產的自然條件和技術力量。根據黨所規定的人民公社發展生產的方針和我社的特點，應該根據工農業同時並舉的方針，發展社辦工業，並大力發展蔬菜生產和畜牧業，為城市服務，滿足城市副食品的需要。發展蔬菜生產和畜牧業以及工業生產，需要較多的劳动力和資金，需要集中使用技術力量。但在公社化以前一鄉几社，人力、物力、財力都比較分散，而且很大一部分婦女劳动力被束縛在家務勞動中，因此，很難根據國家的統一計劃和本身的特点，發展多種經營，貫徹為城市服務的方針。例如北太平莊站，靠近城邊，不僅土質好，肥源足，送肥也方便，但過去為了保證糧食自給，在1958年，全部1900畝耕地中，種植了1500畝糧食，蔬菜只種了400畝左右。由於北太平莊站靠近護城河，水源也很好，過去因為劳动力和資金不足，不能很好地加以利用。其它工作站和生產隊，也有類似的不能很好地利用本身特點的情況。因此在1958年公社化以前，在18000畝耕地中，糧食作物的種植面積達15000畝，蔬菜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13頁。

的耕地面积只有2000余亩。由于饲料缺乏，畜牧业的发展也受到了限制。由于资金和技术力量不能统一集中使用，在公社化以前，原来农业社所办的工业，只有农具厂、豆腐坊、大车铺、粮食加工厂等六个小型工厂，职工人数只有23名。在公社化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如北太平庄就把不适于种植农作物的300多亩洼地，挖成了人工湖（引进护城河的水）养了50万尾鱼。我社根据国家的统一计划所制定的生产计划，完全体现了工农并举，发展多种经营，为城市服务的方针。在我社今年的生产计划中，把蔬菜种植面积扩大了两倍，由去年的2000多亩扩大到今年的6200亩左右（复种面积达10000亩左右）。为了大力发展畜牧业，并计划种植饲料6000多亩。在大力发展蔬菜生产和畜牧业的前提下，我们本着少种高产多收的原则，把粮食作物的耕地面积缩减了五分之三左右，由去年的15000余亩，缩减到今年的6000亩左右。在工业和副业方面，计划调拨适当的劳动力，组成专业队，经常从事工业和副业生产，计划发展造纸厂、白铁厂、酱油厂、制酒厂、砖窑厂、米面加工厂、颗粒肥料厂、孵鸡厂等20多个小型工厂（其中有一些已投入生产），并积极开展大车运输和挖沙石等副业生产，支援城市的基本建设。这是一个多种经营全面跃进的计划。只是由于实行了公社化，生产资料、劳动力组织集体化的程度都提高了，才使这一计划的实现得到了可靠的保证。

在制定和贯彻上述计划时，我们强调了政治挂帅，在干部中，着重宣传了“全国一盘棋”的重要意义。公社的绝大多数干部经过全民整风运动和公社化运动以后，在政治觉悟提高的基础上，都认识到服从国家计划的重要性，认识到大力发展蔬菜生产和畜牧业，满足城市副食品的需要，是郊区人民公社支援首都建设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挖掘潜力，克服各种困难，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国家计划的要求。但仍然有少数干部对“全国一盘棋”的重要意义，对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系认识不足，片面强调自己的特殊情况和困难，不是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国家计划。事实上，这些同志没有认识到实行工农并举，大力发展蔬菜生产和畜牧业，贯彻为城市服务的方针，对国家、公社和社员个人都有好处。

根据我社今年的生产计划，公社的收入预计将比去年的收入增加一倍以上，而且在今年的总收入中，蔬菜、畜牧业和工副业的收入将占50%以上。

如果我们不贯彻上述为城市服务的方针，而把全部人力、物力和财力都放在粮食生产上，我们的生产就很难迅速发展，公社的收入就很难迅速提高。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忽视粮食生产。党的决议中明确指出，我们应当争取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做到每年的粮食产量，平均每个人达到两千到三千斤，彻底解决粮食问题。为了彻底解决粮食问题，根据国家的需要和我社的特点，我们采取的方针，并不是扩大粮食作物的耕地面积，在粮食生产上投入更多的劳动力，而是少种高产多收，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劳动生产率，缩减粮食耕地面积和粮食生产方面所使用的劳动力，腾出劳动力来，大力发展蔬菜生产和畜牧业，为城市服务，发展社办工业，支援国家的工业建设，以加速我国工业化的进程，并促进农业生产机械化电气化的发展。

#### 四

由农业社转变为人民公社，在分配制度方面，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社和全国大多数人民公社一样，在成立以后不久，就实行了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在供给方面，由公社实行统一的“吃饭不要钱”的伙食供给制；在工资方面，实行统一的六级工资制，一级工的工资为12元，二级工的工资为9.5元，三级工的工资为7元，四级工的工资为5.5元，五级工的工资为4元，六级工的工资为3元。每个劳动力的工资平均为7元。由于目前我社的生产水平和公社收益并不高，供给范围仅限于伙食一项。但供给部分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工资部分的比重。我们考虑到公社化以前，原来各个农业社的经济条件不平衡，各户的劳力和人口不一样，收入有高有低。从我社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的比例来看，劳动力强而人口少的户会减少收入，那些原来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农业社中，劳动力强而人口少的户，收入会减少得更多一些。在党的决议中指出：“目前在确定工资和供给的比例的时候，要注意尽量不使劳动力强而人口少的户减少收入，一般地要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收入比上年有所增加，其余社员的收入比上年也不致减少”。我们为了贯彻党的这一指示，为了使劳动力强而人口少的户，不至于因为分配制度的改变而减少收入，就参照原来各个农业社的经济条件，1957年每户的收入情况和1958年每户劳动力变化的情况，在年终决算时，对那些劳动力强而人口少的户进行了补助照顾，这样分配的



結果，社員很滿意。

## 五

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是我國人民公社在分配方面的創舉。其中供給部分，是共產主義“按需分配”原則的萌芽。目前許多人民公社所實行的“吃飯不要錢”的供給制，並不是什麼人憑空想出來的，而是黨領導勞動人民進行革命和發展生產的結果，是農民群眾在去年糧食大丰收和思想覺悟普遍提高的基礎上的偉大創舉。在舊社會里，多少年來，我國農民群眾在地主的剝削下，整年辛勤勞動，還是“糠菜半年糧”，鬧災荒餓死人是常見的事情。由於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勞動人民進行革命鬥爭，推翻了剝削制度，領導農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使農業生產不斷發展，農民的生活已經普遍提高。但有些農民的生活仍然有困難，如有些勞動力弱而人口多的戶，也有一些勞動力強的戶，或者是因為生活負擔過重，或者是遭到什麼不幸的意外事件，往往在年終決算時，開個“超支戶”，這就是說，平日預支的生活費用，已經超過了他應該分得的部分，在決算以後負下了債務。在經濟條件比較差的農業社中，“超支戶”占有一個相當的比重。這些“超支戶”，在決算以後，為了吃飯，又得東借西貸，到處張羅，生活沒有保障，生產也不安心。實行吃飯不要錢的供給制以後，很多社員反映說：“供給制好像鐵飯碗，不愁吃，不愁喝，搞生產心里也踏實”。由此可見，這是由於黨領導勞動人民進行革命，推翻了剝削制度，發展了生產，勞動人民才得到了不愁吃、不愁喝的自由。這是最重要最可靠的社会保險。

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吃飯不要錢”，激發了人們勞動的積極性。前面已經談到，公社成立以後，在生產戰線上已經取得了巨大成績，就在今年年初整社期間，討論分配方案時，廣大社員在黨委的領導下，掀起了一个積肥高潮，僅僅十天的工夫，就積肥一億多斤，超過了黨委所提出的指標一倍。當然，就目前的生產水平和社員的思想覺悟而論，供給部分所占的比重不宜過大，如果過大，以至否定了“按勞分配”的原則，就會妨礙人們的勞動積極性。黨在熱烈支持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的同時，也批判了那種認為包得越多越好的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思想傾向。根據黨的這一精神，我們在貫徹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時，對勞動力強而人口少的戶進行了補助照顧，這一方面使勞動力強而人口少的戶增加了收入；又使勞力弱而人口多的戶得到了可靠的生活保障，從而也就有利於調動最大多數社員的勞動積極性。

## 六

人民公社化運動，是一個涉及到幾億人口的群眾運動，而且運動的發展，是如此之快，只經過短短的幾個月的時間，全國農村就基本上實現了公社化。這是一次具有深刻意義的經濟和政治的變革，是走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目前，在黨的領導下，正在開展群眾性的整社運動，對廣大社員進行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思想教育，並吸收過去高級農業合作社的有用經驗，結合公社一“大”二“公”的特點，建立和健全一些必要的制度。這樣，人民公社的優越性將能得到更加充分的發揮，在生產戰線上將取得更大的成績。



## 人民公社的組織原則——民主集中制

曾 庆 敏

民主集中制是我們党和国家机关的組織原則。为了使人民公社順利地发展，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提高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在人民公社組織內也必須实行民主集中制。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指出：“人民公社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無論在生产管理方面，在收入分配方面，在社員生活福利工作方面，以及一切其他工作方面，都必須貫徹执行这个原則”。

人民公社应当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实行統一領導和分級管理的制度。

在实行統一領導和分級管理的制度时，不能只強調統一領導而忽視分級管理。統一和分权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当然，人民公社在統一經營方面比高級农业合作社要优越，它可以統一进行生产规划，能更合理、更有效地使用劳动力和生产資料；它統率着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但是，人民公社的管理范围是这样大，經營的范围又是这样广，要真正实行有效的統一領導，把人民公社的各项事业都办得很好，那就必須实行分級管理和权利下放，使管理区和生产队在組織生产，进行經濟核算，对社員实行分配和管理社員集体生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权利。至于高級农业合作社的好的經驗以及某些在目前有积极作用的制度，仍然應該繼續使用。

在人民公社組織內正确地实行統一領導、分級管理的制度对发展生产有极大的好处。例如在公社內兴办工业的問題上，有的人民公社将小型的、季节性的直接服务于农业生产的土化肥厂、肥料厂、飼料加工厂、农具修配厂等划分給管理区管理，而公社只

管理鉄农具厂、木工厂、水泥厂、砖瓦厂、电站等比較大的厂矿企业。这样，公社一級組織的領導干部就可以抽出更多的時間去研究一些重大的問題，可以集中精力抓好农业生产，又可以办好少数比較大的重要厂矿，能更好地使工业为农业服务，从而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又可以使干部有更多的時間去参加生产，更多地去联系群众，这有利于克服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缺点。而对管理区、生产队的干部和一般社員來說，能够更加强他們的生產責任心，更充分地發揮他們的积极性和創造性，使他們既参加生产，又管理生产。这样，就能使全社上下通气，團結一致，發揮一切积极因素，促使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加速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的发展更快地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使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能充分地表現出来。

然而，在強調分級管理的优点时，如果忽視了統一領導，那也是錯誤的。在明确划分管理区和生产队的职权的同时，还必須要服从公社的統一領導，統一规划，強調部分服从整体，小利益服从大利益；強調各生产队必須保証执行并完成公社的生产計劃，分配和积累計劃。这样，才能符合便于加强党的領導，有利于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有利于联系群众和發揮群众的积极性，精簡机构，充实下层；减少非生产人員的原則。

在实行統一領導、分級管理制度的基础上，还必須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来貫徹执行分层包干的責任制度，以便能更进一步挖掘劳动潜力，合理地分配和調度劳动力，充



分發揮各級組織和每個社員的勞動積極性和主動性。

生產責任制是在廣泛發揚民主的基礎上建立的。要搞好公社的生產不是某些領導幹部可以包得了的，而是首先必須依靠社員政治覺悟的提高，自覺積極的勞動，但同時還需要有相應的責任制來作保證。這就是說：要迅速發展生產，公社的領導有責任，公社的全體社員也有責任。因此，在建立生產責任制時，不僅在公社的領導上要建立管理責任制，而且還要將責任制貫徹到每個社員，即根據公社總的生產任務，作到層層分清任務，人人交清任務，作到事事有人負責，人人對生產負責。

領導方面的管理責任制就是指公社領導必須在加強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明確公社、管理區、生產隊各級管理組織應該負的責任，同時各級組織應該是既有集體領導，又有分工負責。在社員中建立生產責任制那就是規定和執行勞動定額的問題。根據不同的農活，把完成任務的數量、質量和時間規定下來，交給社員負責包干完成。社員在明確了自己的生產任務後，就會大大提高勞動積極性。正如有的社員所說：這樣有奔頭，有標準，功過分明，懶漢也變勤快了。當然，在實行這種責任制的時候，首先必須政治掛帥，不斷提高社員的共產主義覺悟，發揮社員的集體主義精神和自覺的勞動熱情。同時，還必須貫徹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無論是各級領導方面的責任制和個人責任制都需要服從上級組織的領導，全面安排。在遇有臨時突擊任務時，必須服從公社的統一調撥進行大協作，這樣才能避免分散主義和本位主義。但同時還要廣泛發揚民主，依靠群眾，防止強迫命令、主觀主義等工作作風，才能更好地貫徹執行責任制度。

人民公社組織軍事化是改變我國農村落后面貌、加速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最好的勞動組織形式。實行組織軍事化並不和民主集

中制的原則矛盾。黨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對組織軍事化的性質作了明確的說明：“所謂組織軍事化，也就是組織工廠化，就是說公社的勞動組織應當象工廠、象軍隊那樣地有組織有紀律，這是大規模的農業生產所必需的。”

組織軍事化有助於民主化的實現。因為軍事化能使群眾的生活更集體化，使幹部更容易與群眾打成一片，他們和廣大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在生產勞動中對群眾進行政治思想教育和技術領導；更容易組織群眾展開鳴放和辯論，因而也就更容易聽到群眾對生產、生活各方面的意見。所以我們說組織軍事化為幹部廣泛發揚民主和大走群眾路線創造了優越的條件，並推動了民主化的實現。反過來，民主化又能使軍事化發揮更大的威力。當群眾充分地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之後，經過大家辯論和領導的研究，消除了那些不正確的意見，最後得出正確的結論。然後，將群眾自己的正確結論付諸於實際行動。這樣就更有利於集體，更加強了組織性和紀律性，因而也就鞏固了軍事化。同時，由於民主化的實現，在軍事化中不斷發揚民主，有領導地不斷開展大鳴大放和大辯大論，就可以防止命令主義和主觀主義傾向的產生，因而也就能更充分地發揮軍事化的作用。由此可見，軍事化和民主化是矛盾對立的統一體。因此，在實行組織軍事化的同時，必須實行管理民主化，也就是說，必須正確地貫徹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才能充分地發揮群眾自覺的勞動熱情和提高群眾的政治覺悟，從而促使生產力不斷地向前發展。

總之，在人民公社組織內必須貫徹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才能充分地發揮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和創造性。必須時刻記住黨的八屆六中全會給我們的指示，即“公社必須在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的同時，充分地實行管理民主化。決不允許借口組織軍事化，或者利用對付敵人的民兵制

度，而使公社和民兵組織的民主生活受到絲毫的削弱。公社是我國基層政權的組織，只有充分保證公社的民主化，才能在全國範圍

內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那樣一種政治局面”。



## 中国科学院吉林分院法学研究所开展研究工作

中国科学院吉林分院法学研究所是根据省委的指示，在省委和分院党委的领导下，于1958年11月間开始筹备建立的。共設四个研究組，分別研究人民公社，中国國家与法的理論，中国民事、中国刑事各方面的問題。目前全所人員已經积极地行动起来，开始了各項科学研究活动。并且在1月30日全所人員的大会上，又进一步討論了关于法学研究工作的方向、方法，以及专职与兼職研究人員的分工协作、本年度的重点研究項目和題目落戶等問題。

首先，大家在发言中一致認為：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三十几年来，尤其是建国以来，政法战线上的对敌斗争經驗和法制建設經驗是十分丰富的。把这些丰富的阶级斗争經驗提高到理論水平加以科学的总结，对于目前政法实际工作有重要意义。

其次，关于法学研究工作的方向和方法，經過热烈的討論，一致認為：本所的法学研究工作，應該根据中国社会經济发展的規律和阶级关系的变化，結合三十几年的司法实践經驗以及当前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新形势，建立完全适合于中国阶级斗争需要的新法学体系。因此在确定研究項目上也必須采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針。一方面进行系統的全面的理論性的研究和总结；另一方面也要結合当前当地的具體問題进行研究。以期达到法学研究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再次，为了迅速的开展各項研究活动，如期完成研究工作計劃，关于如何更有效的組織研究力量，也进行了热烈的討論，并初步提出了一些办法。

通过此次會議，本所的各項研究工作，将在过去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开展，大家也一致表示，鼓足干劲、苦干、实干加巧干，努力爭取提前完成本年度的工作計劃。

(中国科学院吉林分院法学研究所通訊組)



# 論 合 同 制 度

協 鳴

## 一、合同的意義和作用

合同制度是以訂立合同的方式把某種經濟關係結合起來的制度，它包括的範圍很廣，就合同的性質來講，可以分為買賣、供應、包工、借貸、租賃、運送、保險等各種各樣的合同。這裡要着重討論的是有關生產、交換與消費方面的合同。

在國家的生產計劃中，主要包括產、運、銷三個過程，這三個過程結合的好壞直接影響到生產的發展與國家計劃的完成。實行合同制度就是把這三個過程很好的結合起來，使全國的生產單位攪成一股勁，共同完成和超額完成國家的生產計劃。因此，實行合同制度，對於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和加速社會主義建設起着重要的作用。具體說來，它的主要作用有以下几点：

第一、保證國家計劃的完成。在我們國家里，所有一切生產單位都有一個共同任務，就是大家都要執行和完成全部的國家計劃。它們的總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在爭取完成這個共同任務時，每一個單位在實際工作中又要根據國家的計劃訂出自己具體的生產計劃，要完成它自己的特殊任務。通過合同制度，它們既可以保證自己計劃的完成，也可以保證別的单位計劃的完成。各單位計劃的完成有了保證，也就是國家總的生產計劃的完成得到了保證。

第二、作為國家計劃的補充。目前在工業和農業方面，我們的國家計劃還只能就各種主要項目提出總的指標，不可能把所有生產全部列入國家計劃。這就需要通過各種形式的經濟合同把分散的計劃外的產品全部納入計劃，使國家的生產能夠得到全面發展，以及滿足人民生活 and 國家出口等各方面的需要。

第三、是執行國家的方針政策的一種工具。國家的方針政策可以通過合同制度具體地貫徹到各個有關單位。例如國家對人民公社的管理和監督可以具體地表現在國家機關與公社所訂的各種形式的合同之中；公社銷售的產品必須符合國家的市場物價

政策，以及國家的統購統銷政策。因此，合同制度本身就是執行國家方針政策的一種工具。

第四、作為指導生產的一種工具。國家可以通過合同制度指導各個生產單位生產發展的方向。國家對人民公社的指導，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人民公社是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結構的基層單位。它是社會主義政權組織的基層單位，同時又是工農商學兵相結合的生產基層單位。在公社里既要發展自給性生產，又要發展商品性生產。雖然各公社有各公社的特點，公社的生產是多種多樣的，但是它的生產不能盲目進行，它需要因地制宜地制訂自己的生產計劃。國家在領導和監督公社的生產、交換和消費等方面也可以通過合同制度指導它發展的方向。在簽訂合同的过程中，國家有關部門的工作人員可以深入公社調查資源，幫助公社制訂各種生產規劃，從而使公社的商品生產計劃更加切合實際。去年冬季湖南祁陽縣商業局同下馬渡人民公社訂了產銷結合合同，幫助公社擴大了黃麻、蠶茧等生產和增添了挖冬筍、採野生藥材、狩獵等方面的生產<sup>①</sup>。

又如天津市新立村、美滿、先鋒、小站等公社，最近制訂生產規劃時，得到市藥材公司的指導，擴大了市場需要的各種藥材生產，市土產公司也通過與公社簽訂的合同，指導公社生產大量草蓆、草繩等基本建設施工需要的物料<sup>②</sup>。這就是通過合同國家對公社的生產起了指導作用。

第五、促進城鄉產品交流。要促進城鄉產品交流，人民公社與其他有關單位的聯繫配合是一個主要因素。“各個公社應當根據自己的特點，在國家領導下，同別的公社和國營企業實行必要的生產分工和商品交換。”<sup>③</sup>交換計劃的實現，就要廣泛地實行合同制度；把公社的產品銷售給城市或別的兄弟公社，同時換回公社所需要的消費品，以滿足社員生

① 參考1959年2月4日“大公报”記載。

② 參考1959年2月20日“人民日報”記載。

③ 中共中央八屆六中全會“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

活上的要求，換回公社所需要的機器、設備，實現農業機械化和電氣化。因此，實行合同制度是加強城鄉之間、工農之間以及鄉鄉之間聯繫，從而促進產品交流的重要工具。

## 二、合同的內容與形式

合同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只要訂立合同的雙方就合同的主要內容意見表示一致時，合同就算成立。主要內容一般是指合同的標的物（例如產品的名稱、規格）、數量、價格和期限等項目。但是，為了使合同易于貫徹，避免在執行中發生爭議，除了上述項目以外，在合同中還應該明確雙方的權利義務和責任。

目前我國各生產單位，在執行國家總的生產計劃的前提下，也出現各種不同形式的合同：有的直接訂立書面合同，把合同的具体內容和條款都在合同內訂明；有的經過兩個經濟作業區協議以後，再由基層生產單位簽訂合同；有的實行卡片制度，把合同的主要內容填寫在雙方的卡片上，而把一般性的合同條款訂成統一規則；有的實行票據制度，由雙方填寫一定形式的票據代替了合同的形式；也有的用往來文件取得一致意見而不具備合同的一定形式。以上各種形式都具有合同性質，可以根據業務上的需要分別適用。

我們的合同制度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合同制度。在資本主義國家里，生產資料屬於資本家所有，生產處於無政府狀態，資本家利用合同的形式來進行壓迫和欺騙，千方百計地以侵害別人的利益來滿足自己獲得最大利潤的目的。他們不但不能按照合同的內容誠實執行而且要曲解合同的規定，鑽合同的空子，從而推卸自己的責任。在我們這裡，合同是完成國家計劃的保證，雙方對於合同的內容必須嚴格執行。因此，在訂立合同時，對於合同的內容應該仔細考慮，作好準備；要把合同的要求列入自己的生產計劃，必要時儘可能經過群眾討論，使合同的執行變為群眾的共同任務。這樣，對於合同內容的執行和完成，就有了可靠的保證。

## 三、正確樹立對於合同制度的看法

解放以來，在我國各個經濟部門中已實行了合同制度。在完成國家計劃，發展國民經濟方面也會起到一定作用。但是，還有少數人對於合同制度仍存

在各種不正確的看法。他們認為我國各個經濟部門的利益是一致的，大家都為完成國家任務而努力；合同上的甲方乙方原是一家，何必計較合同內容和具體條款，更談不到違約的責任等規定；又認為合同任務不能完成是大家的事，不能由那一方單獨負責。也有人認為現在群眾覺悟都已提高，不必依靠合同制度來解決經濟關係上所存在的問題。根據這些思想情況，在執行合同制度時就產生了各種不健康現象。有的人忽視合同的作用，不把合同的內容與自己的生產計劃嚴格的銜接起來，以致合同到期不能執行。有的定貨雖已制成，但由於本單位需要，就違反合同的規定，而不肯將定貨交與原定單位。也有的由於合同不能保證執行，經常調派幹部到現場去等貨。從以上這些現象來看，由於不能嚴格貫徹合同制度，不但浪費了人力物力，而且也影響到各單位生產計劃的完成。我們國家的生產計劃是“全國一盤棋”的整體計劃，一個合同的不執行，往往會連續影響到幾個合同不能執行，幾個生產計劃不能完成。因此，那些強調甲方乙方原是一家，不必計較合同上的具體條款，以及借口群眾覺悟提高，不必再訂合同等說法，實質上只顧到它本身的利益，而沒有為國家的整體利益着想。

還有人認為合同制度會使生產大躍進受到束縛。這種說法也是不正確的。首先，我們不能把生產躍進與合同制度對立起來，它們之間並不矛盾。每個生產單位都不是孤立的，它要滿足別的单位生產上的需要，同時也要別的单位來滿足自己生產上的需要。如果不能嚴格執行合同制度，自己生產上的需要不能滿足，對於生產躍進就會受到一定的影響。其次，隨著生產大躍進，在產量增多，質量提高以後，不但對於原有的定貨合同可以滿足，而且要大量補充新合同，使自己的產品能廣泛地銷售出去，同時收購自己生產上所需要的原料和機器，為生產獲得更大躍進創造有利條件。

## 四、合同的法律地位

黨的八屆六中全會在“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為了保證交換計劃的實現，要在國家和公社之間、公社和公社之間，廣泛地實行合同制度”。中共中央與國務院在“關於適應人民公社化的形勢改進農村財政貿易管理體制的決定”中也指出：“今後除了國家規定的統購任務和統銷指標以外，公社向國家出售什麼，出售多少，要國家供應



什么，供应多少，以及产品质量、交货时间等等，都应当尽量用合同的形式规定下来。合同一经订定，双方必须保证共同执行”。这两个指示是非常正确而又及时。这两个指示肯定了合同的法律地位和它的约束力，进一步澄清了那些对合同制度的不正确看法。

为了贯彻合同制度，除了双方自觉地保证执行外，对于违反合同的一方应予责任上的处理；否则，在违反合同造成损失时，听任遵守合同的一方遭受损失，而违反合同的一方毫无责任，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在合同中或者有关规章制度中应该规定有关责任的条款，使违反合同的一方适当地负担他方的损失。一般生产单位都实行经济核算制，通过货币结算，可以表现出它们工作上的成绩或者缺点；在执行合同的时候，使违反合同的一方

负担经济上的责任，是有一定促进作用和积极意义的。至于双方对于合同的执行发生争议，可以根据争议的性质提交行政管理机关处理，或者提交法院裁决。这样，都是为使合同的效力得以充分发挥，合同制度得以很好地贯彻而着想的。当然，如确实发现合同有不妥之处，也可以经过双方协议或一定手续予以修改的。

目前在各地人民公社中已逐步推广合同制度，并且在一些地区已经行之有效。随着生产的大跃进，我国各地人民公社以及各经济单位之间的联系和配合将更加密切和频繁。为了进一步促进生产，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应该根据党的指示广泛地实行合同制度，认真地订立合同，严肃地执行合同，以保证国家计划的完成与超额完成，在去年生产大跃进的基础上获得更大的跃进。



## 关于资产阶级法权残余问题

北京大学法律系科学研究小组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本文着重探讨在经济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性质、作用以及消灭途径等问题。

### 一、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性质

马克思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时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不是已经在自身基础上发展了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因此在各方面，即在经济、道德和智慧方面都还保留其所由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社会。”<sup>①</sup>这就是说，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因此，不免在“经济、道德和智慧”等方面存在着旧社会遗留的痕迹。正是由于新社会还不可避免的存在着旧社会的痕迹，所以“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普通称为社会主义的阶段）中，‘资产阶级式的法权’还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局部取消，只是在已经达到的经济改革范围内，即只是在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但是，它在其另一部分中却依然存在，它依然是社会各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sup>②</sup>我们认为马克思、列宁这些原理，就是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重要指导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式的法权”或“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在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方面，随着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变，私有制度的消灭而消灭了。但是在产品分配和分配劳动的领域里，“资产阶级式的法权”或“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依然起着调节

的作用。

在我国产品分配和分配劳动上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依然起着调节的作用，是由于在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的结果。尽管解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城乡关系、工农业关系，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消灭了历史传统的对立状态，但是，根据客观条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还不能立刻彻底铲除这些差别，使工农业劳动和城乡之间还没有达到完全平等的程度，特别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存在，使人们还不能既能从事工业劳动又能从事农业劳动，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因而在分配劳动上很大程度上还受历史传统的“旧式分工”的制约。

这就是以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为特征的那种“旧式分工”。伴随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消灭了它们之间的对抗，但却不得不保留它们之间的重大差别。这种差别的主要表现是按劳分配的原则。“按劳分配”原则还保留着“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残余，这是因为产品还是按工作、按劳动来分配的。按照这个原则来分配产品，人们付了一定的劳动，就有权利换得相应的报酬，这是平等的；但是，作为同一的标准，适用于在劳动能力的强弱各不相同和生活负担的轻重各不相同的劳动者，这就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莫斯科中文版，第21页。

② “列宁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42页。



意味着享受上的差别。所以，它在形式上还保留了资本主义社会“等价交换”的原则，就是说还是资产阶级所提出的，但在实践上不能实现的那个原则——“等价交换”、“平等”在产品分配上起着调节的作用，它还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界限。显然，这还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

这种由旧社会脱胎出来的痕迹，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产物，而是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它和资产阶级法权有着必然的历史联系性，然而又有原则的区别。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经济领域中所保留的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它不仅已经远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完整的资产阶级法权，而且就其所包含的内容来论，它已不是由资产阶级掌握，为资产阶级服务，用来发展资本主义，而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掌握，为社会主义服务，用来建设社会主义。它既不反映资产阶级意志，也不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时由于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已消灭了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了小农经济，从而消灭了产生资产阶级法权的经济基础。由于阶级的逐步消灭、人剥削人的消灭，也将消灭产生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基础。所以，虽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保留了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也只不过是利用其形式，而赋予新的内容罢了。

资产阶级法权这种性质，在马克思和列宁的经典著作中，早已作了精辟透彻地分析。但是有的同志却认为，既然资产阶级法权是以形式上的平等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也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因而两者之间没有原则上的区别，只是量的差异罢了。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忽略了问题的本质，混淆了两种不平等的原则的区别。

必须了解，平等这一概念不是抽象的，是有着鲜明阶级性。因此，离开了阶级观点，就不能理解什么是平等，什么是不平等。无

产阶级的平等要求，只有经过无产阶级革命，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剥削阶级，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才能完全实现。在我国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生产资料私有制已经基本消灭，剥削阶级的不平等基本上已不存在。但是还有另一种“不平等”，这就是现在讨论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残余问题。这个“不平等”和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所保护的不平等，无论从不平等的性质，产生不平等的根源以及包括的范围，消灭不平等的途径来说，都是根本不同的。

第一，资产阶级法权所保护的不平等是与资产阶级利益相联系的，是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不平等。它是基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基础上的不平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却是基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社会产品还不够充裕，以及人们的思想道德面貌还没有完全共产主义化所形成的，只是人们在产品分配上还有事实上的差别。

第二，这两种不平等在范围上也是根本不同的。资产阶级法权所保护的不平等包括着：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占有生产资料，不劳而获，在政治上享有特权，在文化教育上是知识的垄断者，而无产阶级则一无所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所表现的范围，主要是指在产品分配上所存在的事实上的差别。在我国除被依法剥夺某些权利的人以外，人们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生活上都是处于平等的地位。

第三，正是由于两种不平等，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因而在消灭不平等的途径上也是根本不同的。对资产阶级法权所保护的不平等，必须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手段，因而消灭这种不平等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而对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所存在的事实上的差别，则是通过高度发展生产力水平和提高人民的共

产主义觉悟来达到的。因而消灭这种“不平等”，除了在政治思想领域里还必须与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外，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并与自然进行斗争。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两种不平等完全是属于两种不同范畴的不平等，必须明确地加以区分，我们绝不能仅从形式上看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也存在着人们之间事实上的差别，就混淆了资产阶级法权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两者原则上的区别。

另外有的同志认为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同资产阶级法权一样，都是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这种观点也是不对的。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社会里的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主要的是指消费品分配方面的“按劳分配”原则。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按照生产资料占有多少来进行分配的。“按劳分配”、“不劳动者不得食”正是和资本主义的分配原则根本对立的。由此可见，作为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主要表现的“按劳分配”原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它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

那末，是否有人会问，你既说它是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又说它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这不矛盾吗？我们以为马克思之所以把“按劳分配”原则叫做资产阶级式的法权，是说它在原则上（即“等价交换”的平等权利）还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界限，同共产主义的理想比较，是一个缺点。指出这一点有重要意义，使我们知道按劳分配虽然同旧社会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有缺点。因此不去迷信它，而是正确地用它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并且创造条件来使它消失。但马克思绝不是说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因为按劳分配这一原则，除了从资产阶级那里拿来“等价交换”的原则把它用在分配上以外，按劳分配与资产阶级是毫无关系的。就

以“等价交换”的原则而论，它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才把这个原则真正实现了。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却只是一种形式、外表。正因为这样，我们虽然认为“按劳分配”原则是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但在一定阶段上它是和资产阶级斗争的武器，而且就其真实内容和实质看来，它同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还是根本对立的。反之，如果说“按劳分配”既是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那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是资产阶级的呢？正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下“按劳分配”的原则是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所以它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才能起积极作用。

## 二、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作用

在我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个分配原则基本上适合我国经济条件和人们的思想觉悟水平的，因而是不可避免的，在一定时期内它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由于“按劳分配”原则仍然不曾超越资产阶级法权狭隘眼界，所以也有着一定的消极的作用。

“按劳分配”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

1. 我国解放前，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经济、文化落后，工农业不发达，生产力水平很低，因此，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可以便利于统计和监督生产，合理地进行劳动分配，建立生产责任制和经济核算制。这是有利于生产的发展，有利于社会产品的增加，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和为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

2. 由于人们在旧社会里长期受着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因而在某些人的思想中有轻视体力劳动、按酬付劳、少劳多得、不劳而



获等等剥削思想还不能在短期内肃清。正是由于“按劳分配”的原则是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上，从而使具有这些思想的人们，逐步改变对劳动的态度，培养重视劳动以至热爱劳动的观点，造成“劳动光荣”的社会风气。

3. “按劳分配”原则所体现的“不劳动者不得食”，是作为资本主义“不劳而获”的分配原则的对立物而出现的。“按劳分配”就是拿劳动作为分配社会消费产品的标准，这同不劳而获来作比较，就是最大的平等。同时它对那些长期脱离劳动的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所哺育的好逸恶劳的人们来说，使他们参加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显然是一项重大的革命措施。

事实证明，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生产水平不断提高，跃进再跃进，生产力空前增加，同时人们的思想面貌，也在迅速改变，应该说，在分配制度上采取按劳分配的原则，已经起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的。

“按劳分配”的原则，虽然有上述的积极作用，但是，在生产水平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它的消极作用也在逐渐增长。这是由于：

首先，人们的体力强弱、技术水平等不同，还会有收入多少的差别，采取“按劳分配”的原则，必然存在着事实上的差别。同时，按劳分配也会助长某些人不正确的劳动态度，例如计件工资制，就会使有些人计较定额，挑肥拣瘦，忽视产品质量，浪费原材料，等等，其结果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按劳分配”，每人收入不同，物质享受上就有差别，这就容易助长某些人的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思想和雇佣观点，斤斤计较个人利益，等级观念，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群众思想觉悟的提高。

当然，某些人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并非完全由于“按劳分配”的原则所造成，而“按劳分配”的原则，只是起了一定的助长作用。因此，我们不同意有些同

志将一切不良现象和资产阶级思想都算在“按劳分配”的账上。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在同一“按劳分配”的制度下，有的人在劳动中成了模范、英雄，而有的人却成了懒汉？

这里也使我们更加清楚的认识到：政治挂帅，提高人们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在发挥“按劳分配”的积极作用和限制其消极作用上具有多么特别重大的意义。可见，即使我们在运用“按劳分配”原则的时候，也不但要看到物质鼓励的作用，更重要的还要看到政治思想工作的作用，必须把物质鼓励和政治思想工作密切结合起来，不能只见物不见人。

“政治挂帅”就是首先承认并且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既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又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并且正确地处理我国社会内部的矛盾。因此必须把对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原则同关心群众物质利益的原则统一起来，这样虽然不可能完全克服“按劳分配”原则制度本身所带来的消极作用，但是，可以在一定程度内限制这种副作用的发展，为逐步实现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创造精神条件。

既然，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如何来对待呢？为了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着重批判目前所存在的两种主要错误的看法。

一种是对“按劳分配”抱着一棍子打死的态度。他们认为既然共产主义社会的标志是“按需分配”，所以便要马上放弃“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而实行“按需分配”，以便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些同志分不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联系和区别；不懂得革命发展的阶段论，不了解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乃是经济上发展程度上不同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虽然这两个阶段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前者可以向后者过渡，但两者之间仍有一条线，不能随意越过的。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乃是一个相当长和相当复杂的发展过

程，在这整个复杂的发展过程中，共产主义的因素虽然日益增长，但社会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因而产品分配也只能以“按劳分配”的原则为基础。如果不顾现实条件，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取消“按劳分配”而实行“按需分配”，结果必然由于违反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革命发展的阶段性，给革命事业带来紊乱和损失。我们必须了解：采取什么样的分配方式，并不决定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决定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和社会产品丰富的程度，“按需分配”虽是更完美、合理的制度，但它只是在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以后才能实现，如果脱离当前生产发展水平，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实行按需分配。其结果必然会妨害人们劳动的积极性，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产品的增加，也就不利于共产主义的实现。这不仅是一种轻率表现，而且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所以，一切真正热爱共产主义事业的人绝对不是条件尚未具备时，企求废除“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而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鼓足干劲，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充分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

另一种错误看法，就是把“按劳分配”原则绝对化起来。他们认为“按劳分配”是绝对合理，是最公平不过的。他们认为多劳多得是天公地道，万万动摇不得的。显然这只是看到“按劳分配”平等的一面，看不到它的不平等的一面，只看到分配上是按劳动这个尺度，也看不到今天现实生活中已经出现了“按需分配”的萌芽，因而将它看成是万古不变的真理。这种思想的实质是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为一种永远不变的东西，不了解一切事物都是按照客观规律不断发展变化的，从社会主义进入到共产主义，乃是社会发展的客观

规律。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而共产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事实证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社会产品在日益丰富和人们的思想觉悟在不断提高，工农、城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也都在日益缩小，将会逐步消失的。因而“按劳分配”原则的消极作用也会逐步明显。因此，在社会主义的一定发展阶段上，“按劳分配”原则的逐步消失就同样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对待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问题，一方面要看到它存在的不可避免性，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它将逐步消失的必然性。

### 三、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基本途径

我们知道，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残余，首先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全国解放以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对于解放和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在三大改造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党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基本精神就是要高速度地来发展我国社会的生产力。无论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转变，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是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同时，也反映出是我国生产关系的某种变革，标志着社会生产力将进一步的发展，而每一种转变和过渡又都反映着不同质的变化。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高速度地发展我国工农业生产，党提出了几个并举的方针。几个并举方针的意义不仅可以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同时，也是实现工业和农业紧密结合和加速缩短城市和乡村之间差别的具体途径。因而也就必然有利于反映这些差别的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逐步削弱和逐渐消除。



几个并举的方针便于我国社会组织的基层单位即人民公社兴办工业，促进公社工业化。由于人民公社兴办工业的结果，农村已不再是单纯从事农业生产，这种亦工亦农的发展趋势，不能仅仅看作是农民劳动场所的简单改变，也不能仅仅看作是农民又学会了一套与农业生产有区别的工业生产技能，而应看到农业生产的劳动条件将逐步发生变化。随着我国工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生产就会源源不断的得到最新的技术装备，以机器代替人们繁重的劳动，并向“农业生产工业化，田间管理工厂化”的方向发展。这样，工农业生产将紧密结合，我国农民也将成为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既能从事农业生产，又能从事工业生产的新型劳动者。工人农民之间由于劳动条件悬殊所产生的差别也将逐步消除。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基层工业必将较全面发展，既有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又有生产生活资料的工业。全国广大农村一旦都办起工业来，我国工业将会出现星罗棋布的繁荣盛况，就将形成我国的工业体系，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利于社会主义生产的分工现象就逐步消失。在农村工业生产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我国农村的面貌将得到根本的改变，将使原来落后的农村变为先进的工业化的农村。同时随着农村工业的发展，农业生产就将逐步实现机械化和电气化，随着机械化和电气化的发展，农村的交通条件，邮电通讯设施、科学、文化、教育和卫生等事业，将得到相应的改善和发展，与此同时，旧的城市也将得到根本的改造。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指出改造和建设我国现有城市的方针：“城市中的人民公社，将来也会以适合城市特点的形式，成为改造旧城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的工具，成为生产、交换、分配和人民生活福利的统一组织者，成为工农商学兵相结合和政社合一的社会组织”。这样，农村与城市的差别也就逐渐消除。当然，反映这些差别的资产阶级法

权残余也就逐渐消失了。

在破除反映资产阶级法权的这三种差别中，最后消失的将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和农民的差别主要是基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形成的，城乡差别实质上是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之间差别的反映。工人和农民、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别，只是两种不同体力劳动和两种不同社会生产的差别的反映，不带有阶级对立的性质，并且将随着人民公社的建立和发展，集体所有制的改变，工农业并举，亦工亦农等，使两种差别逐渐消失，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的差别的消失，除了积极发展生产力以外，还要经过较长时期的共产主义教育和更复杂的思想斗争过程。

在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方面，党给我们提出了明确的方向。实践已经证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是消灭两者间差别的最好的办法，“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群众知识化”是唯一正确的途径，在谈到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时，不能只强调把体力劳动者提高到知识分子、工程师、技师的水平，而忽视了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对于广大工农劳动群众来说，应该彻底改变他们在旧社会被剥夺了学习文化科学技术权利所造成的文化科学上的落后状态。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我国不少知识分子，长期接受资产阶级教育，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轻视体力劳动。因此，必须动员他们参加体力劳动锻炼，在体力劳动中改造思想，彻底转变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并学习生产技术和实践经验，使他们成为手脑并用和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为了使“工农群众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党先后提出并贯彻了学校向工农开门；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干部下放，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在企业中进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等一系列

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的实施，大大改变着我国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的面貌，逐步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

在工农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推动下，目前我国已掀起了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的高潮。可以预料，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随着生产的发展，将逐步缩小以至最终消灭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

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以及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只能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人民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而逐步消除。因而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加强党的领导，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残余大力进行批判，从人们思想领域中加以破除和肃清，这是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另一项重要措施。我们绝不能认为既然在过渡时期资产阶级法权残余还不可避免的存在，而且在今后的相当时期内，在分配制度上还有其作用，因而对于提高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以及对于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抱着放任态度，这是完全错误的。应该看到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存在势必对人们起着腐蚀作用，而且思想中的阶级敌人不肃清，则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也就不会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

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彻底肃清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是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精神条件，虽然生产发展本身也会推动人们觉悟水平的提高。

大破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同树立共产主义思想是一个统一的思想斗争过程。只有破除旧的，才能树立新的；而旧的破除得如何，也应新的树立得如何作为主要标志。因此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同时，就必须贯彻党的加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方针，大力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不断提高人民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

应该指出，全国人民经过整风和反右斗争，工农业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也必须肯定，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在一些人们的思想上还有着很深的影响。因此，必须坚决的批判并和它决裂，用共产主义思想来代替它。

综上所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基本途径是高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大力提高人们的共产主义思想水平；并在此基础上消失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三个差别的消失，当然，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也就自然消失了。

## 补 正

“资产阶级法权”一语，经过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应为“资产阶级式的权利”。本刊本期文内有关资产阶级法权的用语，改为“资产阶级式的权利”。

“政法研究”编辑部

1959年3月28日



## 关于按劳分配和资产阶级法权残余问题

孙 亚 明

关于按劳分配和资产阶级法权残余问题，目前主要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按劳分配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第二种意见认为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原则，不是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第三种意见认为按劳分配既是社会主义原则，又是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我赞同第三种意见。现将我个人的一点不成熟的看法提出来，请批评指正。

大家知道，分配或分配制是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特别是由生产关系中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消费品的任何一种分配，始终只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后果”（见“哥达纲领批判”）。

在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下，由于地主阶级占有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所以那时的分配是按照地主占有的土地多少来进行的，地主占有的土地越多，榨取的地租也就越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群众，惨遭封建剥削，过着终年不得一饱牛马不如的生活。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由于资产阶级占有工厂、矿山、铁路等，所以这时的分配是按照资本家拥有的资本多少来进行的，谁拥有资本多，谁就能榨取到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处于资本剥削下的无产阶级，则经常挣扎在失业和饥饿线上，连最低生活都不能维持。只有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下，由于剥削阶级被打倒，生产资料归劳动人民所有，社会上才实行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在这里，每个劳动者都根据自己给社会提供的劳动的质

量和数量而取得相应的消费品。至于剥削阶级分子，他们必须在劳动中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样，“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社会主义原则，也就通过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得以实现。

作为生产关系组成部分的分配制，要比较作为生产关系基础的所有制更加明显地表现着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实质。在一切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分配制都表现着剥削阶级和劳动者阶级之间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分配制表现着摆脱剥削的劳动者间的利益一致和互助合作的关系，他们在平等地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共同为社会为集体而各尽所能，社会对所有劳动者一律实行按劳分配。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劳动者的生活也普遍逐步提高。

有的同志认为按劳分配似乎是资本主义的分配原则，理由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就资本家与工人的直接关系来说，他们付给这个工人或那个工人多少工资，原则上则是以工人的劳动为尺度，即‘做多少活，给多少钱’，或以劳动日计，或以产品数量计，多做多给，少做少给”（见1959年1月27日“人民日报”第七版）。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第一，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是劳动力商品的买卖关系，这种买卖关系隐藏着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资本家购买劳动力不是按劳动而是按劳动力的价值付酬。劳动力的价值只等于工人在劳动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因此，无论从工人的全部劳动（包括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来看也好，或是单从工人再生产自己的劳动力价值的必要劳动

来看也好，我們都找不出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实行按劳分配的影子；第二，工資是劳动力的价格，資本家付給工人工資总是低于劳动力的价值。資本家用計时工資或計件工資付給这个工人的工資多些，付給那个工人的工資少些，也仍然是以每个劳动力的价值为依据，而决不是“以工人的劳动为尺度”。一个工人按計时工資制所做的時間越长或按計件工資制所做的件数越多，他所消耗的精力也就越大，再生产这种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价值也就越大，因而这种劳动力的价值就要高些，工資就要多些。很明显，这里实行的是商品交换的等价原則，而不是按劳分配的原則；第三，通常在分析資本主义企业中工人的工作日时，我們所以把它分为必要劳动時間和剩余劳动時間两部分，例如在十小时的工作日中，五小时是必要劳动，五小时是剩余劳动，这只是为了便于說明問題。其实，資本家对工人进行的剝削，是貫串在每一小时当中的。在加班加酬的情况下，如果剩余价值率是100%，那么，工人每多做一小时，就要多給資本家創造半小时的剩余价值。显然，就是在这里，資本家对工人也并没有实行按劳分配。

总之，在資本主义社会里，分配是按資本进行的。資本家掌握着生产資料，指揮着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并根据是否获利和获利多寡而購買或多或少的劳动力，从而发财致富。而工人則是在出卖劳动力当中横遭剝削之余取得一点可怜的代价。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当生产資料和劳动者相分离的現象一扫而光，劳动群众做了社会财富的主人的时候，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則才破天荒地在社会上实现。

在社会主义社会，按劳分配是势在必行的客观規律。这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早已指明，并为社会主义建設实践所証实了的。很明显，在生产資料已为全体劳动人民所公有的情况下，在生产力还未发展到使社会产

品极大地丰富起来的情况下，在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道德品質还未极大地提高起来的情况下，只有实行按劳分配，才能使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充分发挥，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使社会生产迅速发展。

## 二

按劳分配虽是社会主义原則，但它同时又是資产階級法权残余。如上所述，資本主义社会既然从来就没有实行过按劳分配，因此，可以肯定說，那种認為按劳分配是資本主义的分配原則，因而按劳分配就成了資产階級法权残余的看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为了弄清为什么按劳分配是資产階級法权残余問題，我們有必要重温一下馬克思和列宁关于这个問題的闡述。

馬克思在“哥达綱領批判”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每个劳动者“从社会方面領得一张收据，証明他供給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憑这张收据又从社会儲备中領得与其劳动量相等的那么多的消費品……”。显然，这里通行的就是那个調节商品交换的原則，因为商品交换是同等价值的交换。……这里平等的权利在原則上仍然是資产階級法权”。接着，他进一步指出：“这个平等的权利，对于不同等的劳动是个不平等的权利”。馬克思在这里揭示了資本主义社会里資产階級法权的一般的特点，这就是：用形式上的平等来保持实际上的不平等。問題很清楚，劳动者个人的具体情况是各不相同的，有的劳力强些，有的劳力弱些，有的技术水平和熟練程度高些，有的技术水平和熟練程度低些，有的結了婚，有的沒結婚，有的子女多，有的子女少等等。由于存在着这种种的不同，所以尽管所有劳动者都按劳动的質量和数量領取消費品，但在他們中間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实际生活上的“不平等”，即存在着收入多少的差別，从而有的过得富裕些，有的过得稍差些。



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被保留下来的仅只是一个残余，因为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之后，过去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存在的不平等便被消除，资产阶级法权在这里已无藏身之地。正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法权’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只有在这个范围内，也只能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才不存在了”。也就是说，在所有制方面，在劳动群众当中已实现了平等。但在分配方面，一定程度的差别还未消除，而这个差别也就是残存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很明显，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和巩固，体现资产阶级意志的那套完整的资产阶级法权，早为群众革命所粉碎，而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起来的，已是体现无产阶级意志的无产阶级法权了。因此，从旧社会所保留下来的，只能是资产阶级法权残余而已。

当然，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法权残余，这无疑是一个“缺点”。可是马克思指出，这个“缺点”在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并认为这是从资本主义带来的“旧社会的痕迹”。关于这点，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曾着重指出：“马克思并不是随便把‘资产阶级的’法权塞到共产主义（指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作者）中去，而是抓住了刚从资本主义腹内脱胎出来的社会里那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东西”。又说：“无论在自然界或在社会实际生活中，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新事物中有旧的残余的情形”。

可见，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是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分配方面带有的“旧社会痕迹”在法权上的反映，也就是附着在无产阶级法权这一“新事物”上面的“旧的残余”。从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来说，这个残余只能作为资产阶级法权形式的残余而存在。至于这个形式所反映的内容的实质，则与

过去已完全不同。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所反映的在分配方面的差别，已经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间的不平等，而只是摆脱剥削的劳动者因个人具体情况不同而造成的差别。

根据以上马克思和列宁的论述，按劳分配是以同一的劳动为尺度而适用于不同的劳动者，这样就势必保留劳动者之间一定程度的实际生活上的差别，而承认分配方面的这一差别，从法权上来说，就是资产阶级法权残余。

有的同志说，按劳分配“只能称为资产阶级式法权，不能有其他称呼”，并认为马克思和列宁也都是这样提法的。而所谓“资产阶级式法权”，据说指的是：“社会主义在分配上还保留了资本主义‘等价交换’的痕迹”。其实，翻阅一下经典著作的原文，就会发现“资产阶级式法权”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法权”一语翻译之误，丝毫没有与“资产阶级法权”不同的另一种含义。至于把它仅仅理解为“资本主义‘等价交换’的痕迹”，这是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按劳分配所以被称为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是因为在等价交换的这一形式上平等的背后隐藏着实际上的差别。

另外，有的同志根本否认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根据上述，可知这种观点既与马克思和列宁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断背道而驰，又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

### 三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力地证实了马克思和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在社会主义社会仍将存在的这一科学论断的正确性。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人民在经济、政治、思想各个战线上已取得无比辉煌的胜利。通过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财产的没收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通过整风反右斗争、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

运动，我国社会上最后的剥削阶级虽然还未完全消灭，但实际上它已不掌握生产资料了。因此，就劳动人民内部来说，在政治关系和生产资料占有关系方面，已实现了完全的平等，人人是新国家的主人，人人是社会财富的主人。但是，在分配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别，即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因为在这方面我们基本上是实行按劳分配制度的。现在，我们在国营企业和机关中实行的是工资制，在人民公社中实行的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我国的工资制和资本主义工资制有原则的不同，它是以按劳分配为基础的。我国的实践证明，按劳分配是有两重性的。一方面，按劳分配否定了按资本进行分配的制度，它不仅是改造剥削阶级分子的重要武器，是实现“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一社会主义原则的有力保证，而且还能鼓励工人、农民和干部提高业务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便于统计和监督生产，便于建立和巩固生产责任制和经济核算制，从而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所以它是社会主义原则，有积极的一面。但另一方面，按劳分配不如“按需分配”更加合理，它保留并承认劳动者之间生活消费上一定程度的差别，所以它是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有消极的一面。

只看到按劳分配的积极一面，只看到它是社会主义原则，因而希望把它永远地保持下去，这是错误的。同样，只看到按劳分配的消极一面，只看到它是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因而想要把它立即消灭，这也是错误的。我们对按劳分配首先应该有正确的认识，然后才能有正确的态度。必须认清，目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阶段，尽管我国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着社会主义，但由于我们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要建成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总还需要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我们确信不久的将来会在中国建立起“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但现在我们还生活在“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因此，对按劳分配我们只能采取既肯定又否定的态度，这是唯一正确的态度。所以要肯定，是因为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原则，我们应当在政治挂帅下让它充分发挥积极作用，以便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社会产品日益丰富，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所以要否定，是因为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我们应当根据客观情况有步骤地限制它的消极作用，防止劳动者之间收入有不合理的过分悬殊，积极地创造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使共产主义因素在我国社会中逐步增长，使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逐步缩小，为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但是，在各种必要的条件还没有成熟之前，我们决不能单凭主观愿望而轻率地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关于这点，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经济上发展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更合理，但是这只有在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以后才可能实现。没有这个条件而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会妨害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就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产品的增加，也就不利于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



# 对本刊編輯工作的檢查和改进意見

本刊編輯部

在本刊去年第五期发表的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工作报告中，对本刊的編輯工作做了严肃的檢查和批評，报告肯定了本刊的成績，指出了本刊的主要缺点和錯誤，提示了改进方向，并責成我們在整风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檢查，拟定改进方案，提高刊物質量。我們誠懇地接受这些批評，并决心依照报告的提示，紧密依靠党的领导和广大讀者的支持来把刊物办好，使它成为党在政法战线上的有效的工具——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的、理論密切联系实际的政法研究刊物。

## (一) 过去本刊編輯工作上的主要缺点和錯誤

过去本刊对若干重大的政治法律理論問題和实际工作問題，曾发表了一些使讀者获益的文章。但长期以来，在我們的編輯工作中却还存在着脱离斗争、脱离实际、为学术而学术的非政治傾向；突出的表現是对一些重大的政治斗争，沒有及时发表社論，組織有关的文章。例如：1955年10月，当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的決議”，同时并发表了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的著作以后，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飞速发展，全国农村发生了极其伟大的深刻的变化；但是我們的刊物，在这一時間，却沒有从法律上、理論上給予应有的闡释。編輯部沒有为此写过一篇社論，并且，除迟至1956年第二期才发表两篇专题文章外，再也沒有認真組織对这一伟大課題的研究和討論。又如在1957年本刊第四期出刊时（8月2日），全国已經轟轟烈烈展开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但是本刊沒

有发表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社論和文章，直到第五期（10月2日出刊），才刊出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專輯。此外，在一个时期內，我們对若干重大国际事件，也沒有及时在本刊上表达我国法学界的态度。这些事例，使我們深切的認識到，在我們的編輯工作中脱离政治斗争的錯誤傾向是严重的；我們缺乏作为一个編輯，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工作者应具有的高度严肃的政治态度。

在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这一时期，由于我們存在着严重的右傾思想，在我們的刊物上登載了右派分子楊玉清等人的反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謬論之后，沒有及时地給予有力地反击。迟到1957年10月以后我們才发表批判右派分子謬論的文章。

我們还发表了一些具有旧法观点和右傾思想的文章。諸如散播“有利被告論”（突出的例子如1957年第4期发表的“关于我国刑事訴訟中辯护人訴訟地位的研究”）、“无罪推定論”（突出的例子如1957年第3期发表的“略談刑事訴訟中被告人的訴訟地位”）等旧法观点的文章占了相当部分。这些錯誤事实，証明了：我們过去还没有在思想上与反动的旧法观点决裂，在若干重大問題上，沒有与旧法观点分清界限，以致未能給予及时有力的批判。

綜上所述，可見我們在過去一个时期內是犯了右傾錯誤的。我們犯以上錯誤的最基本原因是由于我們的无产阶级立場不够坚定，思想鍛炼、思想改造还跟不上政治形势的发展，加以我們长期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斗争，政治感觉迟钝；基于这一切，因而对毒草缺乏应有的政治嗅觉和識別能力，对于

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政法工作本身所体现的强烈的阶级性、战斗性认识不足，对于我们的刊物所肩负的斗争任务认识不足，因而这就使我们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

经过整风和反右派斗争，自1957年第五期以后，我们改进了工作，以反驳右派分子谬论、批判旧法观点、阐释政法方面的重大问题为中心，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以服务于当前的重大政治斗争。但是即使在这个期间，仍然是有不少缺点的。例如我们仍然感到在组织研究和阐释政法工作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的工作上，还做得不够及时，不够周到，不够深入，因此刊物内容还显得不够充实，不够丰富，等等。我们深切认识到今后我们还必须在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改进工作，才能适应大跃进新形势对我们提出的要求，较好的满足读者的愿望。

## (二) 1959年本刊的 编辑工作计划

“政法研究”自1959年第1期起已改为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和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合办的刊物。其1959年的编辑计划扼述如下：

### (一) 方针

(1) 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和法的学说，宣传、阐释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文献中关于国家和法律问题的指导思想，研究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和政法工作基本经验，并进一步批判资产阶级法学思想。

(2) 坚决依靠党的领导，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服务，及时准确地进行有关的宣传解释工作，并注意组织研究政法工作中的新问题。

(3) 紧密配合当前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斗争任务，加强刊物内容的思想战斗性，提高理论水平，发展学术研究。

### (二) 今后各期主要内容的安排

(1) 对当前重大国际事件、国家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依据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及时撰写适当形式的评论（社论、或短论、专论等）。

(2) 密切注意关于人民公社及公社化后在政法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经验的研究。力争及早刊出如下各项论文和资料：

根据法学研究任务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所作的各项专题研究论文；

根据法学研究任务对人民公社所作的调查报告和专题研究；

对人民公社化后政法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经验的专题研究。

(3) 今年7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三十八周年和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十周年，我们准备刊出纪念特辑（第3期）。

(4) 今年的国庆节，是我国建国十周年纪念，深入研究、总结我国政法工作的基本经验，是我国政法工作者的一项庄严任务。我们拟在本刊第5期（10月2日出版），彙集如上论文，刊出纪念特辑。

(5) 进一步批判资产阶级政治法律思想。主要是对旧法观点的进一步的批判；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国家论和法律观的进一步的批判。

(6) 注意加强关于法学界动态的报导。

刊出的文章力求精炼。在这方面我们期望得到作者同志的协助。

在党的领导下，为进一步提高我们的刊物的质量，除我们自己必须作艰巨的努力外，还需要政法界各方面的同志大力给予我们支持，经常给我们撰稿，给我们提出批评和改进工作的意见。我们相信紧密地依靠党的领导 and 广大读者的支持，就一定能把刊物办好。



动 态

##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 科学研究簡况

自去年9月开始，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掀起了全党动员、人人响应的群众大搞科学研究的高潮。半年来，根据理論联系实际的方針和师生結合的原則，坚决地貫徹了党的教育方針，下乡下厂、大办工厂、下公社；到各司法业务部門参加工作、作調查、參觀等；同时認真地鑽研了馬列主义經典著作和党的政策。共写出論文一千多篇，其中主要有論述人民公社、政法工作、批判資產階級法权以及批判旧法观点、修正主义等几个方面，編出六部論文选集。此外，这个期間还写出“論人民公社”、“論人民民主专政与人民民主法制”等十几部专著。为配合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还編輯了“人民公社調查資料”、等資料。

目前全系师生正在集中精力共同着手法学教材的建設工作，在今年7、8月間将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与法权历史”、“新形势下的政法工作”、“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专著，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的献礼。

(呂世崙)

## 北京政法学院科学研究近况

北京政法学院自从去年学习党的教育方針以来，在党委领导下，結合教学、生产劳动和实际工作，广泛地开展了群众性的科学研究工作。由于紧紧地依靠了党的領導，坚持了理論联系实际、群众路綫、領導与群众相結合、师生合作的正确方針，因而取得了显著的成績。目前，全体师生在現有成績的基础上，繼續鼓足干劲，爭取以更大的丰硕成果来迎接我国国庆十周年。为此，各教研室、各班級都在制訂或修改科学研究計劃。当前的科学活动，主要有下列几項：

一、进一步修改北京政法篇初稿。为了提高編写水平，更好地进行修改，参加者还学习了有关文件，武装自己的头脑。

二、今年有講課任务的一部分教員和一部分高年級学生合作編写或修改政治經济学、刑法、国家与法的历史、司法鉴定和国家法等有关課程的講义。

三、一部分教員参加十年来人民司法工作經驗总结工作。

四、与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法律系及中央政法干校等兄弟院校协作，搜集和整理审判法、国家法等課程的資料，准备深入彻底地批判旧法。

(培)

## 法律出版社初版新書

###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規彙編 (1958年7月—12月)

国务院法制局編 現已出版 定价：精 2.50 元  
国务院法規編纂委员会 平 0.90 元

本書是国家的重要法規彙編。內容包括：自1958年7月至12月的法律、法令、国务院的決議、命令以及中央各部門的重要命令和指示。

### 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約集 (第七集) 1958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編 4月份出版 估价：1.30元

本集收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政府和政府各部門）在1958年同外国簽訂的48个文件（包括条約、协定、議定書、換文、联合声明、联合公报等）以及在1958年加入的一个公約。此外，还收集了一个非政府性的文件，作为附編。

### 中国人民福利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办公厅編 4月份出版 估价：0.70元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指出，要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群众的干劲越大，党越要关心群众生活。党越是关心群众生活，群众的干劲也会越大。为了贯彻党的指示，进一步改善人民的生活福利，内务部从各省（区）党委理論刊物、中央和地方报纸以及内务部刊物中选出34篇有关人民生活福利方面的文章，編成此書，比較集中地反映了党的指示的精神和各地的具体經驗。

全国各地新华書店发行